

生活在继续

一份来自民间视角下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

□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2009 年 3 月

目 录

编者按

.....第 3 页

生活在继续（上）——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个案篇）

.....第 5 页

“当我们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久未见面的故人；当我们的心灵感受到这片土地一丝一毫的震颤，故乡的现状和未来。我们尝试着用久不执笔、惯于劳作的手，真实地记录下金融危机中，发生在一个个小城镇、小村寨、打工者身上的真实故事；记录下一个群体的生存现状，梦想与希望。”

生活在继续（中）——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数据篇）

.....第 17 页

“调查显示，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农民工收入降低、失业。同时，调查也显示，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收入整体上有一定的增长，但随着城乡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有了新的期待。”

生活在继续（下）——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建议篇）

.....第 39 页

“农民工尽管遭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工资下降、失业等直接影响，但并未将其视作严重性的危机，他们正在通过自身的调节，努力将遭受到的不良影响自我化解掉……”

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

.....第 42 页

“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自身蕴含的潜能，希望通过专业的服务，协助他们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危机必然孕育着机会，这场转型漫长而艰难，协作者愿与所有农民工朋友一起走过。”

金融危机，我们反思什么

.....第 44 页

“没有一个农民工在外找不着工作就返乡犯罪，这道理也是常识……在理论与资讯泛滥的时代，我们需要回归到常识去看我们的生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编者按:

我们眼中的金融危机

——一份由农民工参与完成的调查报告的背后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丝忧虑尚未退却，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如果说温暖的阳光带给我们新的希望，那么于寒冷之中我们则更加明了，独自一人没有温暖，独自一人不能幸福，没有人是汪洋中的孤岛。全球性的经济寒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寒冷；而 2000 万农民工兄弟提前返乡，他们遭遇的困境，也必然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

春节前，一包一包的问卷由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交付到农民工朋友手上。这次返乡，他们将发放一批问卷，同时对村子里的打工者进行访谈，并完成一份访谈报告。

这些因经济原因、因为去年的大雪，两年甚至多年没有返乡过年的农民工朋友们，小心地把问卷塞进已经打得瓷瓷实实的行李里。他们中有些人，只有不到五天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他们说，多给我装上 20 份吧，我们村打工的人多。

我们为什么做调查？

金融危机是一件大事，谁都没法对它不理不睬。作为为流动人口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忽视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就等于忽视了 2 亿农民工兄弟，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尽绵薄之力。

我们为什么请农民工参与调查？

这些农民工，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日子始终根植于土壤。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大地的震颤，也更密切地关注周遭的变化。他们更清楚自己正遭遇着什么，更明白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依然想不明白，“怎么外国的银行倒闭了，我在中国这边就没了工作？”他们没听说过什么“蝴蝶效应”、“涟漪效应”，但他们从不埋怨，他们思索，并努力寻找自己的答案。城市的生活经验让他们长了更多见识，有了更多主见，他们已经不是旧时的农民工。

协作者作为一家致力于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在金融危机来临的那一刻，如同每一次开展服务从农民工兄弟姐妹的需要出发一样，就开始了对农民工朋友在此危机中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并时刻提醒着自己：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这次调查，再一次让协作者感动，再一次让协作者自豪，为那些亲历调查的打工朋

友在调查中的沉着担当；为那些被裹入危机的打工朋友对生活依然的乐观相向、积极主动……当收到短信：“我在火车上发放问卷，很挤，后悔只带了两根笔”时；当收到一份份认真真手写的调查报告时……谈到金融危机对个人的影响，一个刚到北京打工的18岁小伙子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伤害太大了。我爱我的国家。”

这些农民工正用对待自己家过日子的那股认真劲儿，对待这个国家所遭受的一切。

同时，他们不甘心在这次金融大潮里逆来顺受，他们要改变，他们已经有所行动。

不管是返乡还是留守，南下还是北上，他们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简单的行李一收拾，一条新路就在脚底下走出来。

他们也需要很多的支持。更多的机会参加培训，学技术、学可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各项技能……给自己充电的同时，寻找再次启程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在家乡发展，政策支持、信息支持……甭管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知道上面关注着咱，心里头先就热乎了；更多的就业信息，稳定的工资与物价，个人劳动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要求不高，可以让我们用双手过好我们的生活，就知足啦！”

他们打心眼儿里执着地相信，危机终会过去，就如同冬天总会过去。留下的不是泥泞，而是整个春天。

呈现在您眼前的这份文字记录，并非一份专业性的调查报告，或许有所偏颇，请您谅解。我们愿意与您分享我们的见闻。我们相信，这份来自民间视角农民工的记录，将是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图景的重要构成，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一种意义。

直面危机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我们已经感受到春天的希望。

希望来自于农民工群体。希望来自于我们的政府。危机袭来，国务院及时出台各项“通知”与“办法”，紧贴当前局势细微变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显示出一个大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两会已经召开，我们相信，于其中必然会收获新的希望。

3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更要懂得感恩。感恩这个时代：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如同今天，经历着如此多的困难与挑战，蕴含着如此多的机会与改变。这个时代中的人，不管经受过什么样的挫折与无奈，依然抱有最热忱的希望。我们深感庆幸，为自己正经历并见证着这一切。

但见证不是见证的理由，经历也非经历的终点。我们对于这时代的每一点希望，最终都只有回馈到人的层面才有意义。因此，我们依然需要努力！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个案篇

生活在继续（上）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个案篇）

□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前言：

这个春节，我们收拾行李，返回家乡

一年一度团聚的日子，心里除了往常过年回家时的兴奋、期待，还夹杂着些许不安。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一年的春节与以往有些不同。焦虑的气息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携裹下，由沿海工业区弥漫开来，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增添了寒意。而同时，北方、中西部的中国似乎平静如昨。

09年春节前，协作者委派工作人员、农民工志愿者，在返乡的同时，以问卷、访谈的形式开展当地“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调查”，并撰写返乡报告。

呈现在您眼前的这份文字记录，并非一份专业性的调查报告，而是我们眼中金融危机下自己的家乡。当我们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久未见面的故人；当我们的心灵感受到这片土地一丝一毫的震颤，故乡的现状和未来。我们尝试着用久不执笔、惯于劳作的手，真实地记录下金融危机中，发生在一个个小城镇、小村寨、打工者身上的真实故事；记录下一个群体的生存现状，梦想与希望。

与您分享我们的见闻。我们相信，这份来自民间视角农民工的记录，将是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图景的重要构成，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一种意义。

■ 北京地区

柴米油盐中的变化

当国际金融危机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出现的时候，北京的生活还依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着，打零工的、收废品的、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各行业的打工朋友并没有太多地感觉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来自媒体的声音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让人揪心，但大家却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中开始感觉到细微的变化……

胡同深处起波澜

打工地：北京市内二环的胡同社区

这是二环以里典型的老北京平房居住区，长长的胡同里住着 1300 余名流动人口。在这里居住的农民工，做小生意的比较多，很多就将买卖做在了胡同里，开个小卖部，或者夜市卖小吃，早市卖菜……

在胡同开小卖部的小王，春节依然营业到夜里两点，钱不好挣了更要辛苦工作，挣钱养家。“一闹金融危机，大家都谨慎了。好多人即使有钱，也放在自己腰包里，不敢花。”小王分析起来：“就像今年春节，从街上放鞭炮就能看出来。像以往都是买好多，年三十儿晚上能放两小时，可今年听响声就能听出来，大家都没舍得买，意思意思就完了。可第二天又想放，就又买点，基本上都是一点一点地买，一点一点地放。没有以往的豪爽劲了！”

来自安徽的小杨也在胡同里开了个小卖部，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小杨感慨道：“这金融危机闹的，影响还挺大！”外地人少了，直接的反映就是来打长途电话的少了。小杨家经营的公用电话，打长途 1 毛钱一分钟。5 部电话机，以前一到晚上打电话的都排队，逢年过节队排得就 longer。现在就 2 部电话在外面放着，都很少有人打。“外地人回去了，本地人谁没事儿跑这儿来打长途啊。”

旅游的也少了，来买东西的自然也少了。以前在这儿工地上干活的人也不来了，他们没有活儿做了，都回老家了。

小杨家里光租房每月就得 1200 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吃的用的都要花钱。大孩子的学费倒不是很高，就是学校组织的今天去旅游明天看个话剧。“四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啥啊，不去还不行！可这都是钱啊，车费、门票，再加上吃的，哪回都得 100 多元，现

在挣钱真是难啊！”没有办法，小杨的老婆现在做了两份兼职，每天下午、晚上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做饭，一个月有 1000 多元的收入。上午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还要在小杨拿货的时候照看生意。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小杨压力很大。“让孩子去老家上学，他奶奶年岁大，管不住他。其实家里比这好多了，房子比这宽敞，吃的自己种，花销也低，可挣不到钱啊。现在也是没钱，把这两个孩子给养大成人就知足了。不攒钱了，够四口人的花销就可以了。”

在夜市卖小吃的老夏观点和小杨却不一样。“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物价太高了，反而今年的生意很好，卖得不错。”43 岁的老夏年轻时很能折腾，开过饭店，倒卖过服装，还卖过炸鸡，经济比现在这会儿富裕。要二胎的时候媳妇一下子生了龙凤胎，计划生育罚了钱，这几年一直都没有翻过来。

金融危机反而给老夏的生意带来了转机。“现在孩子都长大了，还都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不太合适，想找房子一直都没有合适的。现在可以留心找找了……”老夏盘算着将来的生活。

■珠江三角洲

海啸已经登陆

对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者，这个冬天格外漫长寒冷，假期到来得无比的早，整个冬天无比的轻松：不用加班、放长假……打工者在轻松中开始不安：明天的工作会是怎样？加工制造企业密集区，服装、电子、玩具等制造企业和外贸行业订单减少，一些工厂破产、裁员，或以轮流放假的方式，减少企业自身经济负担。不安与躁动，开始在这里蔓延。一些人走了，一些人走了又回，还有一些人继续坚守着，像是守望必将到来的春天。

抓阄决定去留

打工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45 岁的陈姐来自四川，在深圳宝安区一家台资塑胶鞋底厂做流水线工人。对于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来说，经济危机直接导致的就是工资的降低。其实如果只是工资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而现在企业采取的是轮流上班的措施，一批上班，另一批就面临在城市待业的情况。

陈姐所在的工厂，对流水线上的工人采取的措施是：让他们自己抓阄决定谁去谁留。陈姐是幸运的工人之一，抓阄的结果是，她可以留下来。她所在的整理组一共有二十多位员工，年后只有一半可以继续上班，其他员工暂时放假三个月，等企业情况好转之后再把他们召回继续上班。

“她们年龄都大了，四十多岁的人，又没有技术，在这个厂干了好几年甚至十好几年，说走就走了，她们还能干个啥子？有的回家过年了，还有的还在城里等着，盼着假

期结束还能回到厂里上班。”陈姐说。

陈姐的丈夫在深圳的一处工地做工，一年的收入除去自己的生活费，挣了 5000 块。尽管在一个城市打工，陈姐和丈夫也很难见上一面。说起丈夫明年的工作，陈姐也有些发愁，“来年不干建筑了，没活儿，难做。可他就小学文化，不干建筑又能干啥呢？”

辛苦，但依然庆幸

打工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45 岁的张姐，湖北人，在一家台企做厨师，为厂里的中、高层管理者做饭，每月工资不到一千元。原本负责做饭的厨师有两名，可现在厂里要减少支出，于是决定放另外一位厨师三个月的假，张姐就一个人承担起两个人的工作，厂里每月增加 200 元的工资作为补偿。

厂里裁员了，但中、高层的管理者一个也没减，张姐的工作量一点也没有因裁员而减少。她很无奈：“那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得干，毕竟我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其他工友都直接放长假呢。”比如厂里的仓库管理员一下子放假五个月，直接就回家了，这五个月一分钱都没有。相比起来自己虽然累点，但是有工资拿，对于这样的生活她是满意的。

张姐的丈夫在老家种田。有两个儿子都在深圳，大儿子大学毕业，在深圳关外一家工厂做模型设计工作，每月工资 1800，还不够他自己的花销。张姐要不定期地寄钱给他，补充他的生活消费。小儿子初中毕业之后到深圳打过半年工，之后回老家参军，现在在深圳富永做保安，一个月工资有 1200 元左右。张姐自己很节约，自己每月只花费 20 多块的话费，也不买什么，存下 900 多块钱，儿子有需要就给儿子寄去。她工作时间基本每周都是满的，没有休息的时间，只是周末工作强度稍低一点。但周末上班是没有任何加班费的。不过她还有一个额外的收入，“周末老板打牌的时候我给倒倒开水，能得到 50 块钱的收入。”张姐挺知足。

同样，在工厂里担任厂医的小徐也很庆幸。

来自湖南今年 35 岁的小徐，一个月 1000 元工资，厂里包食宿，每周工作 5 天，很是清闲。金融危机来临，正好给企业以减少支出的理由，因为厂医这个岗位本身就不是一个必须的岗位。虽然无法直接辞退小徐，但工厂方面对他做出了放假三个月的决定。

“就这么回家哪儿成，过春节、来年孩子读书哪样不要钱？”放假时间定下来的时候，离过年还有两个月。小徐觉得回家显得时间过早，况且回家了这段时间是没有收入的。两个女儿在老家上学，学费是笔不小的开销。再三考虑之下，小徐决定还是留在深圳另外找一份工作，至于工资待遇，“只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剩下可以寄一些回家给孩子就可以了。”

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寻找，小徐在以前工厂附近一家灯饰厂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不包吃住，每月工资 900 元。刨了房租、水电费，到手的就只有 600 多了。小徐打算先干着，如果三个月假期后，原来的工厂还要他回去继续工作，他就接着当厂医，如果不行……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 长江三角洲

还是要出去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在长江三角洲打工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了，他们的返回，让一个个小村庄焦躁起来。很多人开始盘算，过完节怎么办？走，形势严峻；留下，是更大的考验；就业，难；创业，更难。他们左右权衡着，尝试作出自己的选择。

留在家也挣不到钱

打工地：江苏苏州新区

小刘在苏州新区一个生产硅胶的工厂工作，厂里的产品 80% 都出口。2008 年 10 月后工厂减产，他们不再加班，公司不断放假，工资自然比以前少很多。加上厂里传言说公司要裁员，一些农民工主动辞职回家了。刚到 12 月，公司就对厂里农民工放了长假，只留当地的老员工继续工作。公司说是春节过后有订单再通知他们上班。小刘说其实大家都明白春节过后也不会等到通知的，那只是公司辞退他们的一种借口罢了。

小刘觉得，虽然打工岗位在变少，但在外打工总能赚到一些钱，也可以开阔眼界，反正在家里强，在家里没什么事可做，生活枯燥无味。当然也有想留在家发展的，小刘的一个朋友在外打工三四年了，什么活儿都做过，这次回来看到家乡发展的也不错，有亲戚开了家横幅制作店缺人手，打算先到亲戚店里工作，近期不外出打工。他说，老在外面不是个事儿，打算在家安定下来。

村里组织过培训。“听培训讲座的村民可以领到二十元钱。这样的培训讲座举办过一次，而且绝大多数去听讲座的村民是妇女和小孩，很少有打工者去。”

“打工者一般接受的培训是实习期间在工厂里关于工作技能方面的，现学现用，而关于社会适应，情感宣泄，人际交往方面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小刘说。在这个越来越注重沟通和表达的时代，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对找到一份工作十分重要，农民工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城乡文化有很大差异，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两三年了还是难以适应。

“我们虽然人在城市，可交流对象绝大多数还是我们打工的，融入不进城市的圈子。情感上的交流是人的基本需求，我们也想学学怎样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因此比较需要人际交往方面的培训。”

他乡是故乡

打工地：上海市金山区服装厂

老王是安徽人，45岁，高中文化，在外打工已将近10年，最近几年夫妻两人才凑到一起，在上海金山的这家服装厂工作，挣的钱主要供儿女读书。目前儿子已经工作了，但快到成家年龄，夫妇二人依然感觉生活负担比较重。

在2008年以前，老王每天正常工作将近10个小时，晚上经常要加班。平时国家法定假日也是折半休假。那时厂里效益好，每月能拿到1500到2000元的工资，年终还会发奖金，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近一两年来，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工人开始停工抗议，很多人索性辞职另做打算。老王夫妇也决定09年回家乡到县城找家服装厂上班，不再外出打工。“老家这些年发展得不错，也建了开发区，也有很多服装加工厂。”

于是，借着回家过年的机会，老王考察了家乡附近的开发区。可一圈儿看下来，最终还是决定回上海。“当地的工资太低，环境也没有上海好，这么多年，毕竟熟悉了。”

是啊，这么些年了，毕竟熟悉了！比起老家那空空荡荡的大院子，上海挤挤挨挨的小窝棚反而更像是个家。老王的儿子在2008年高考没考好，直接来到了上海，在亲戚家的打印店打工。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报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考上的希望很大。如果拿到全奖，学费也不用老王两口子操心。尽管眼下经济状况不好，想到一家人即将在上海团聚，老王感到欣慰。

等待一个机会

打工地：江苏南京

老李在南京打工，做汽车质量监测。腊月二十五早上8点，老李坐上了回家的列车，经过4小时的颠簸到了徐州，然后下了火车又坐了1小时的客车就到了家。

老李家的村子位于江苏的最北部，再往北5公里就是山东。一个自然村大约有两千多口人，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平时不忙的时候，年轻的都外出打工。有干装潢的，有干网架工程的，有在企业打工的。只有出不去的老头、老太在家种田，妇女们照顾照顾孩子和老人。村里没有什么企业，只有一个蔬菜加工厂，那些出不去的妇女在里面打工，一个月也就几百元，补贴一下家庭生活。

回到家，好兄弟、好同学聚一聚，聊起工作，都说“就那么回事呗，挣碗饭吃。”金融危机对大家都有影响。在苏州打工的兄弟受的影响特别大，没了工作，元旦就回来了。

老李还有个在深圳打工的朋友，是干质检的，以前一个月拿3000多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关门了，货走不出去，都积压在那里。他们在合同期内的员工，每月发800元生活费在家等通知。另一个在泰兴某造船厂干电焊的朋友，尽管现在活儿还挺多，也

好干，但工资不好要。一天要干 10 小时还不给加班费，现在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拿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李很关注返乡民工培训政策这方面的事儿，专程问了，好多人都知道。说春节前附近村上专门组织了培训，只是大家还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被找了过去，拍照片、填身份证，然后每人领到十块、二十块钱。培训机构好像是私人的，讲的是服装裁剪。对于这样的培训内容，老李觉得太简单了，没有啥意思。老李是做机械的，觉得只有大型机械操作、钳工、车床等才算得上“技术”。另外也该讲讲劳动权益维护等内容，好多农民工在外面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办，怕麻烦就认倒霉了，太憋屈。

过完年老李回到南京，单位效益更不好了，不但降薪，还取消了交通费补贴，以后的状况可能会更差。老李开始考虑创业的事儿，正在等待机会。他做了多年的机械，对这个最感兴趣。创业不容易啊，他希望政府能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上面政策倒是有，但一到村儿里，就连个水漂儿都看不见了。”

■ 中原地带

依然平静的家乡

在北方、中原地区，生活似乎并未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显出格外的不同。尽管物价高了、农作物的价钱下去了、村里的年轻后生有的已经失业提前回了家，在大家眼里，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似乎又有什么不一样了，村里人说不清楚。日复一日，迟缓、平静的乡村生活，正在缓慢酝酿着一些改变。

“姐，什么是金融危机啊”

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大湖村

小艳老家在山东曲阜。村子不大，但人口不少，全村 8 个大队，五千多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种地为主，但越来越觉得种地只能给自己足够的粮食吃，解决了温饱问题，可一到用钱时候，卖粮也换不回几个钱，孩子交学费、村里有人结婚随礼（编者注：送礼，当地方言）什么的，都是个难题。

在打工潮中，小艳村里的人也不落后，个个寻找打工机会，男劳力都出去挣钱，村里只剩下妇女、老人、孩子在家。小艳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爸爸只有特别农忙的时候才在家呆几天，平常看不到爸爸的影子。家里姐妹多，爸爸要外出打工挣钱养活小艳一家，妈妈还在村里承包了很多地，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小艳有好多次在半夜里带着弟弟哭着满街喊妈妈，当时都忘记了害怕。在后来，村里年轻人也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小艳说她妈妈都五十多岁了，还寻找机会要到城市打工呢。她在的村子里这样的情况很多，因为种地实在挣不来几个钱，有时还赔钱呢，水浇田特别贵，遇到

旱时浇一次，一亩地将近需要二百块钱，就更别提人工和化肥了。

现在小艳村里的人都选择外出打工啦，有的初中没毕业就出去了。若是平常不是过年过节什么的回到家，在村里很难找到同龄伙伴。县城的厂子效益也都一天不如一天，很多都倒闭了。

小艳的家乡虽然是孔子的故乡，可旅游业也不是太好，除了旅游旺季，平时参观的人不多，当地经济也不景气，也没有听说相关部门对外出打工者有特殊照顾，只听电视上对农民工开展外出前的培训，但现实中村里没有一个农民工参加过。山东青岛给小艳村所属的县城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多年轻人都在青岛的厂子打工，干得都不错，有的还当了官（编者注：企业管理人员）。这次小艳回家聊天得知，现在厂子的效益不好，工资减少，回来时有的工资都没结清。

“姐，什么是金融危机啊？”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一个22岁的小伙子问小艳，当时她很惊讶——他还没有听过金融危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位小伙子2008年的上半年在山西打工，下半年就回了老家学习开车，打算过年后到北京干修车。是啊，金融危机对于南方打工朋友来说，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北方打工者来说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尤其在小城市里，大家有吃有穿，不想别的。

在小艳的调查当中，有几个过年后不知道去哪里打工的老乡。经济不景气，公司挣不到钱，员工跟着倒霉。许多人过年回家都没领到工资，单位还欠着几千元，也不知道年后还要不要回去上班，上班拿不到钱，不去钱更拿不回来，很是迷茫。

不只是打工者感到了压力，有一承包工程的朋友说，自己的压力也很大，2008年在深圳承包的做装修的活儿，装修费、工人费用都搭了进去，最后的楼盘卖不出去，还不如年后在家找点活干呢。在老家家具厂打工，按计件算一个月也将近2000元呢，就算不想每天往家跑租房每月才60元，还可以和朋友合租，还可以从家里带粮食……省不少钱，地里的活儿也不耽误。

大家都希望当地相关部门能给外出打工者多一些优惠政策，多些具体实际的就业以及发展的支持，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在家乡搞好事业。

年轻人几乎都往土地外走

山东聊城莘县古云镇弓庄村

小娥来自山东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庄，从北京坐长途车10个小时可以到达。村里大概有两千多人，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村子的周边建立起了很多小厂子，村上的人除了种地外，有许多人在这些厂子里打工，还有一些是在油田上班的。在离村子有六七里的地方天天是集市，那个地方的名字叫三厂。三厂的另一头，离小娥家很近的一个叫小三部的集市，也有一些人在那儿卖菜、水果、食品等，主要是卖给打工人的，因为在小三部的附近有个厂子，开了网吧什么的，吸引着年轻人，还很热闹繁荣。

据小娥称，还有一些人去外地打工。以她们家为例，家里共三个孩子，全在北京打工。小娥的亲戚当中，能出去的全出去了，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江苏，有的去了广东。即便是过春节，一大家子人也聚不齐。打工在村子里形成了一个潮流，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年轻人几乎都往土地外走。

这次回家在聊天时没有人主动提到什么金融危机，在辽宁、青岛、贵州打工的更是

连什么叫金融危机都不知道。一些在北京打工的倒是知道，主要是看电视看报纸了解的，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小娥在北京工作的弟弟说：“金融危机就是那些炒股的赔钱了，于是钱就越来越不值钱了，物价上涨。对外资企业影响大，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

远处的危机与隔壁的鞋价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对在山西运城盐湖区黄河市场的打工者来说，似乎觉得今年生意不如往年好了。

在黄河市场搞经营，每月需三百至上千元不等的管理费（即摊位、门店租用费）。打工者的基本工资不高，月收入普遍不足 1000 元，一般的有 800 元左右收入，已经算不错的了。在此地，教师每月 1300 元左右，算高工资。春节临近，大家的生意依然也不太乐观。

小程，25 岁，男，初中文化，山西省运城市龙居镇东辛庄村人，在黄河市场一个男士鞋店当学徒。店是他师傅租的，每年租金是 2550 元，已经有 5 年时间了，一双皮鞋 50 元。见到他时，他们的师傅已经回家了，店里只有小程和他的表兄两个人。

小程准备大年二十九回家，正月十五后再回来。他一天三餐在表弟家吃饭，因为表弟家就在小店附近，和表弟一起租了一个地下室住，只是晚上睡觉时过去，租金每月 50 元。

谈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小程不觉得有什么感受，但他认为影响肯定会有，比如物价上涨、日常生活花费多了，以前一碗米粥五角，现在就要一块钱啦；以前一碗面条二块五，现在都要五块啦；还有金龙鱼牌的油，超市里那种以前卖 30 元一桶，现在要 80 元一桶啦，所以日用品方面花费多了。

别的东西都在涨价，可小程家的皮鞋却依然不敢涨。一是皮鞋料子没有涨价，更因为隔壁做鞋的那家鞋店的价格总是比他们的便宜 5 元钱，所以根本不能涨。对这家做鞋的小店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大，也不如隔壁鞋店的定价来得直接。

眼瞅着农作物的售价降低了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头屯镇安三村

双双的家在香河，从北京火车站坐 938 路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香河县城有 20 多个家具城，被称为“中国家具之都”。村里绝大部分年轻人在从事家具制作、销售等工作，中老年人多在本村或附近村庄打打零工，前往其他省市打工的人并不是很多。

双双原来在河北省唐山市某港口工程总公司做文员，负责公司的工程单、报表、技术单等文件资料。国家为首钢投资建设新厂，填海造路建场地，双双所在公司负责造路工程，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该项目缓建，她于 2008 年 8 月中旬就开始放假，一直在唐山市打零工，做些短期促销的工作挣点生活费。

村上的会计说，村里现共有 256 户居民，人数在 1000 人左右，主要经济来源为种地和打工。其中，打工人数为 400 至 500 人。

双双和村里 10 位在外打工的乡亲聊了聊，其中有两人因为金融危机影响提前放假

回家，一个提前 7 天，另一个提前了 4 个月，此时面临失业；其他人的工作虽受到影响但不至于失业。这些打工兄弟有的在香河县城打工，其他的做办公室文员、木工、流水线工人、营业员、建筑工地工人、汽配厂工人等，月工资收入都在 1000—1500 元左右。

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工厂、工地的活儿少了，加班少了，很多人的工资有所降低，甚至延迟发放。但大家依然觉得金融危机对城里人影响比较大，农村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眼瞅着农作物的售价降低了，玉米原来每斤 7、8 毛钱，现在只有 5 毛 7、8 分钱一斤，影响了农民收入。

过完年，大部分人仍会要出去打工，已经失去工作的人也会先到城里打零工等待公司通知或另找其他工作。大家还是认为金融危机对其打工影响不大，年前打工的地方仍有岗位。其他人认为在家工作难找，对于明年的打算比较迷茫，面临失业危险的那位老乡过年之后也会返回城里打零工等待原公司上班通知或寻找其他工作。

春节将近的中腰村

江西省上高县芦洲乡中腰村

中腰村并不大，一个小时足够围着村子走一圈了。

回家过节的小袁与村民聊了聊，觉得村里几乎感受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腰村离县城的路程有 1 个小时，村民们一般在上午的时候坐班车进城买年货，中午就陆续赶着回来了。售票员说：“上午进城的人挤得车里站都没地方站，一年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金融危机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影响。”临近过年，大家都赶着办年货，村里城里一片忙碌。

中腰村大部分年轻的劳动力在县城工作，偶尔回家看看，帮帮忙。上高县招商引资后，工业区渐渐发展起来，距中腰村最近的有两家鞋厂，工资待遇相对本地其他工厂、其他行业比较好，村里一些更年轻的人大都去了鞋厂工作。金融危机的到来也使工厂订单减少了许多，有时干完一批货可以休息很久，但还没听到有解聘的情况。村里留下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依然种地、养猪，时不时也会进城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做小工赚点钱。

据村民说，村里大概 20 个左右的人在外省打工，有的是两口子在一起，更多的听在外打工的亲戚朋友说有就业机会就出去了，去的地方以广东、深圳、温州、福建居多，一般是做流水线或仓管的工作，工资在 1000 到 2000 元间。

说到金融危机，打工的人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让他们感觉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厂里订单减少了。周边有一些小厂倒闭了，厂子里会裁减人员，有的人认为对出口的行业影响会大些，对中国内部产销的工厂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

大多数人表示春节后依然会回厂里工作。原因在于现在工作不好找，在家赚不到钱，在外面赚的钱多点。个别家里有小孩的人想留在村里不回城了，在家帮忙。

据小袁了解，家乡的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留乡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

“别让工厂随便放假，东西也便宜点”

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套里庄乡

小易今年 21 岁，在张家口宣化县宣化钢铁厂做焊工，每月工资 2000 元左右，这在当地是非常不错的收入，可他现在想换工作了。

“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想换，就是觉得老在一个地方做没意思。”尽管现在金融危机，小易依然对自己能够找到新工作充满乐观，“托朋友帮留心着，有合适的就换。”

2008 年 12 月初，小易就回了老家。“我们单位今年提前两个月放的假。厂里没活儿，留着你还得给你工资，它自然就让你提前回家了。”为什么没活儿了？“这我们打工的也不太清楚，好像就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吧。”回到老家，小易发现，同村打工的人里他是回来最早的，其他大部分都在 2009 年一月初回家，有在北京干保洁的直到春节前一、二天才回来。

尽管金融危机到了，但对于具体是怎么个危机法儿，小易并不是很清楚。春节过后，他还会回到宣化，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当问及就业或创业培训时，小易摇摇头说没听说过。而金融危机，尽管大家都说它影响很大，小易很乐观，相信这些很快都会过去的。不过小易也给政府提了两点建议：“可以的话最好不要让工厂随便放假停工，东西最好也便宜一点。”

■ 未来

出路，总会有的

危机总是伴随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城市发展不下去，返乡；厂里呆不下去，创业；珠三角去不了，往北……压力当前，一个群体自我发展的力量慢慢显露，新的出路慢慢显露。坚持，就有希望。

来年自己当老板

河北省邢台市任县辛店镇象牙寨村

“如果不是闹金融危机，今年可能到大年三十才能回来。效益好的时候请假特别难，天天加班，闹金融危机后工厂不让我们加班，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只能上 10 天的班，我们收入就只有 400 多块，感觉挣的钱还不够我们花的，就回来了。”

08 年 8 月中，小娜和丈夫一起到广东东莞打工，11 月 25 日就辞职回河北老家了。“刚出去两三个月就回来，也没挣到啥钱，还不够路上折腾的呢。”

小娜和丈夫在手机生产流水线上工作，包括做手机屏幕、听筒零件，每月收入大约 2000 元左右，其中基本工资 700 元，其余为加班费，加班费是 8.8 元/小时。“我们公司是家大公司，在天津，北京、广东都有分公司。”尽管已经辞职，提到以前的公司，小

娜依然很自豪。

刚闹金融危机的时候，厂里就不让加班了。工资一减少，好多人就说不干了，但是组长不放。开始，他们以为很快就会过去，后来说不干的工人越来越多，组长接到上面的通知说同意辞职，才放人。

辞了工的人，一时找不到新的工作，快过年了，索性早点回家。有人回家结婚去了，有人打算春节后再去其他厂或其他城市找工作。

不光小娜的厂子，附近的好几个工厂都面临相同的状况。“厂里损失挺大的，”小娜说，“我们生产的产品都是出口的，现在货卖不出，哪有工资。工人在厂子里面没有活，以前的一个老工人跟我说，跟非典那时候似的，无聊死了。”

回到象牙寨村，小娜没有听说任何对农民工的支持政策。“现在其实挺需要技能方面的培训。在外面没有什么文化，找工作不好找。”小娜感慨到，“就想赶快找点事情做，不能在家闲着啊，不好，那样别人会笑话，家里压力也大。”

对于将来，小娜依然有信心。“过了年想在镇子里开个服装店，这事儿我想了好长时间了。以前老觉得资金不够，自己又不是很懂，听别人说风险大什么的，犹豫着不敢做。我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哪里进货，时兴啥衣服，这样心里有准儿了，给自己干，给自己当老板！”

向北，到内蒙去

河北省邢台市任县辛店镇象牙寨村

老王今年 43 岁，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个装修公司从事房屋装修工作，主要做木工活儿。自己在外工作，孩子和媳妇在老家种地上学。

老王的工资按天数计算，上一天班 100 元，一个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有活儿的时候连着干，没有活儿的时候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少了。

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老王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后来买房的人少了，装修的也就少了，活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春节老王回来过年，看到村里做钢筋的亏了不少。去辛店镇的路上，以往分布在公路沿线的那些钢筋小加工厂和几个钢铁贩卖点儿都亏了。“奥运会之前他们生意还挺好的，奥运会一过就不行了，没有人要。”

过了年老王还会回内蒙去，村儿里有几个人合计了一下，打算和他一块儿向北去。“那里物价低，租房也便宜，一个人住的话，五六十块钱一个月就行，还包水电费。”大家很知足。

留乡求发展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淡家村

说到眼下金融危机，在无锡、上海、深圳从事电焊、车床打工的小杨、小聂和小田不以为然，只是加班少了，挣的没以前多了，而且有时候公司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物价也有所上涨，但整体来说不是很严重。“没什么影响，和往年没什么变化。”

“我提前 15 天左右回来的，比往年回来早多了。”在江西九江某电子厂打工的小肖

说，厂里是生产出口产品的，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大。“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技术的工人，都没有活干了，不得不回家。呆在那边还要花销。”小肖叹了口气说：“我现在已经失业在家，未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我是个好人，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

出人意料，作为这一群人中学历最高、职位最高、工资待遇最高的“榜样”，小王成为春节返乡最早的一个。“我11月底就回来了。”小王之前在北京一家汽车公司工作，做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厂里不断裁员，而且效益越来越不好，最后倒闭了。我自己在外面已经漂了几年了，也不想在外面了，所以就早点回家了。其实也是金融危机使我失去了工作，不得不早点回家。”

大家都认为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裁员、减薪是正常现象，是国际大环境下出现的一种必然，应该正常看待。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仍然是制约发展的一大问题。大部分在外打工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

“我打算就呆在宝鸡，先不出去了。”谈及将来的打算，小王说：“我已经25岁了，要考虑婚姻的问题，想离家近一点，而且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想以后方便照顾自己的父母。家里的房子也很好，不想再挣钱买房，这个压力太大。在外面几年了，感觉还是家里舒服，也习惯。而且父母也强烈要求自己近年内争取结婚，所以就打算在宝鸡打工。”

现在，小王已经在宝鸡从事保险业工作。

数据篇

生活在继续（中）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数据篇）

□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居民，他们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我国众多实体企业遭遇重挫，由此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2008年12月，国务院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做好农民工工作提出

了更加细致的政策规定；2009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这是近几年由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部署政策力度最大的一次，不难看出当前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性所在。

那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有哪些，又是如何克服的？他们怎样看待金融危机？现行的社会服务对他们又有多少影响？他们是如何评价的呢？

带着上述问题，协作者于2008年1月中旬开始，委派工作员、农民工志愿者，在返乡的同时开展当地“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现象调查”；同时，针对京津冀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主要劳务输入地的打工者进行调查访谈。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历时一个月，共有33名调查者参与。其中，重点邀请了16名农民工志愿者，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地区以“生活者”的视角进行观察、了解，并参与撰写报告。

调查问卷共设计了38个问题，涵盖了农民工就业情况，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和返乡情况，社会政策支持与服务情况，以及对未来的计划情况四个部分。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6份，回收问卷465份，其中有效问卷422份，问卷发放区域主要集中在劳务输出密集的地区，包括安徽、江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鲁西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10个省；以及涉及农民工劳务输入的重要城市群：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广州等，长江三角洲的南京、苏州和无锡，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以及福建等共16个省市。作为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于城乡社区的民间机构，我们希望此次调查能够为全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协助农民工平稳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为我国社会公共政策的改革和服务创新尽绵薄之力。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268人，占63.4%；女性150人，占35.5%（见图1）；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16-30岁的占了73%。文化程度以初中毕业为主，占45.9%；高中、中专以及职业技校占到32.4%；小学文化程度占到7.1%；大专、本科生占到12.3%；文盲占到1.7%（见图2）。结合协作者于2004年进行的“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比较显示，当时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占21.3%。时隔5年，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中“高中、中专或职业高中”的比例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达到32.4%。同时，农村

青年学校毕业（或辍学）后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进城务工。

图 1：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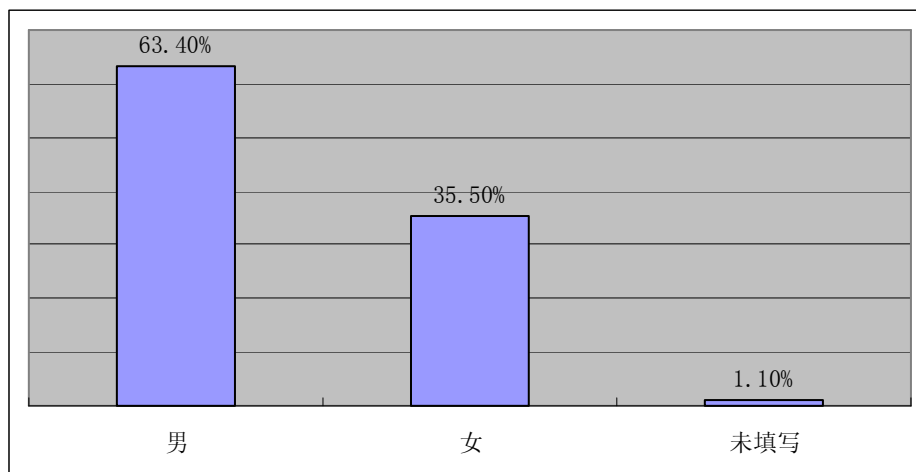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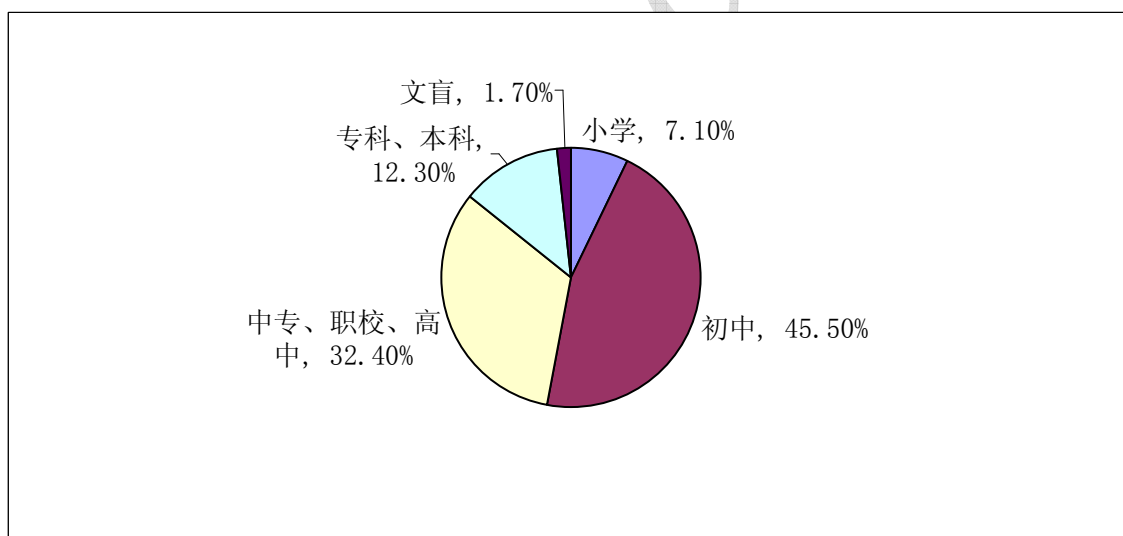


图 2：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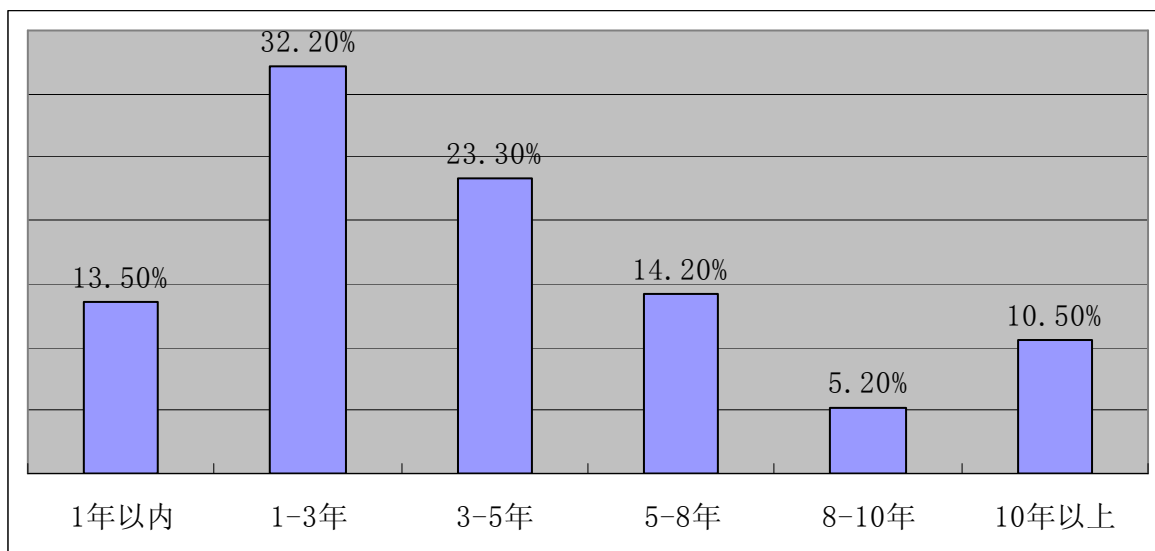


根据问卷数据显示，其外出打工的方式是，“一个人在城里打工”的占到 52%；“夫妻一起进城打工，孩子老人留在家里”占到 23.9%；“和亲戚一起进城打工”的占到 14.4%；“全家人一起进城打工”占到 8.5%。

在 422 份有效问卷中，农村户口占 70.5%；城镇户口占 11.4%。这一数据和 2004 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的数据基本一致，表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同时也可以看到人口密集且就业压力大的中西部城镇的青年居民，也会将到东部沿海大城市务工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选择。

从问卷的统计分析看，在外流动打工时间在3年以内的，所占比例为45.7%；3-5年的占23.2%；5年以上的占29.7%（见图3）。而2004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中，时间达到5年以上的比例是22.5%，从中可以看到农民工长期稳定在外务工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图3：被调查者外出务工时间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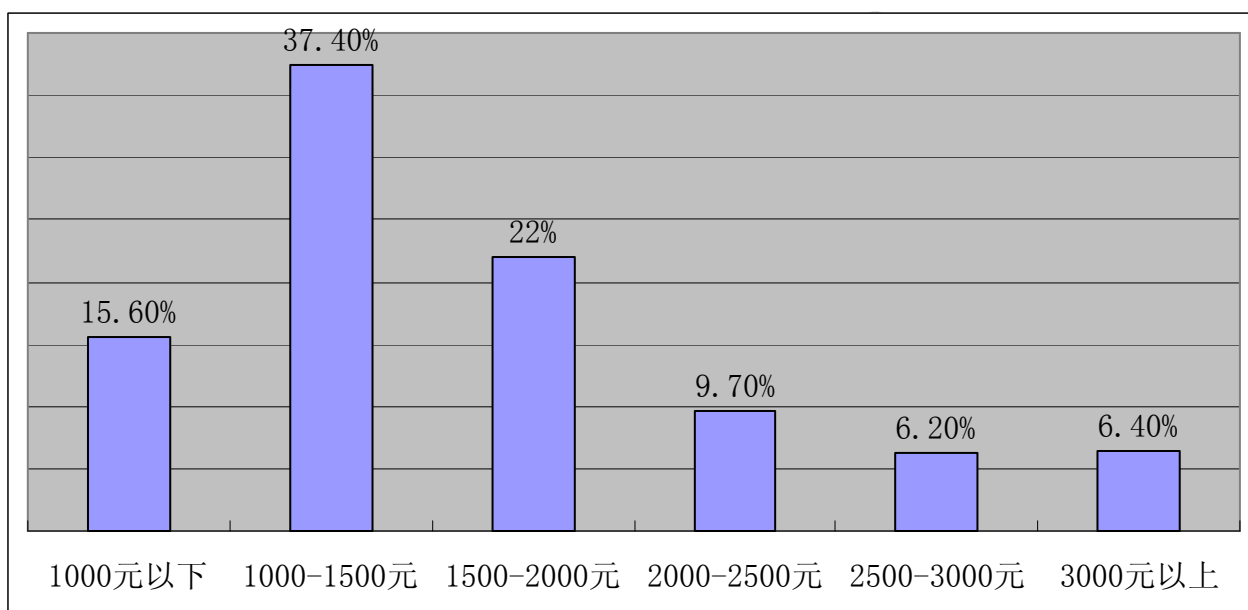
就业渠道

调查分析显示，接受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涉及一部分非正规就业领域。其中，从事流水线普工的占21.6%；技术工人占21%；从事建筑行业（包括装修、打零工）的人员占14%；服务业（包括厨师、服务员、家政、美发等）占7.1%；自己做小生意的占6.6%；管理人员占8.5%；销售人员占8.3%；文员占4%。

结合深度访谈，调查者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工业及建筑业），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企业缩减工作时间、放长假或裁员。而金融危机对于第一产业农业及农村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尚可自给自足的生活，使得部分村民对金融危机毫无概念，即使了解到同村的外出打工者年底被裁员提前返乡了，也并不觉得其中有何不同的意义。同时，乡镇企业在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地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而金融危机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也尚未突出显现出来，金融危机尚未广泛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调查显示, 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在 1000-1500 元间。在 422 份问卷中, 有 158 人集中在该范围内, 占 37.4%; 1000 元以下的占 15.6%; 1500-2000 元的占 22%; 2000 元-2500 元的占 9.7%; 2500-3000 元的占 6.2%; 3000 元以上的占 6.4% (见图 4)。收入在 3000 元以下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服务业工作, 或是流水线工人; 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主要是企业的管理人员、高级技术工人。

图 4: 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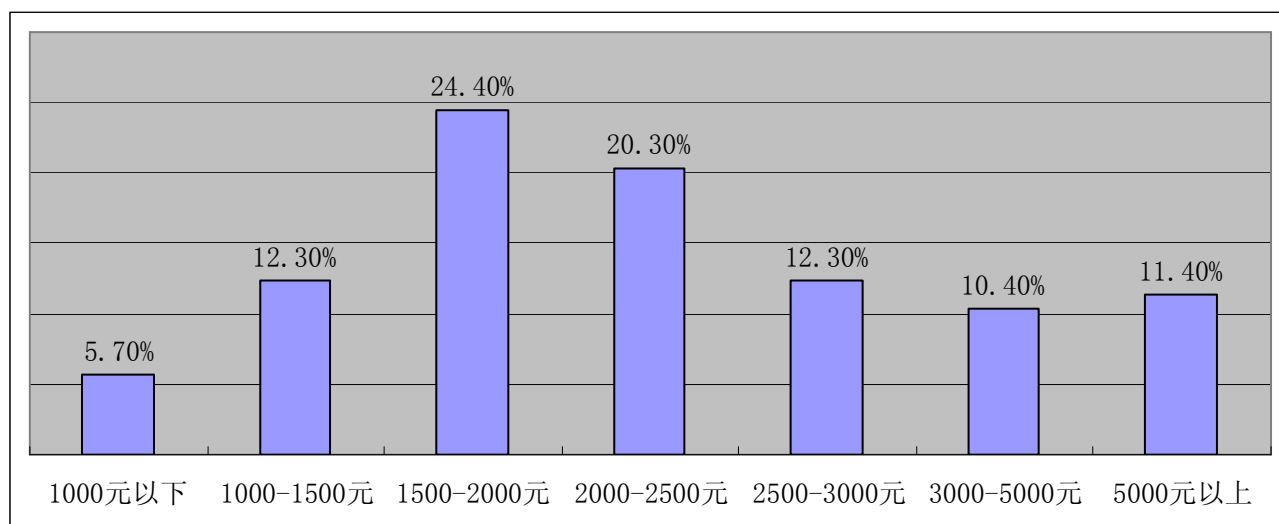
就整体收入水平来看, 2004 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显示, 当时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 500-800 元, 占 58.1%, 月平均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占调查总人数的 84.4%。本次调查, 月均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占 15.6%, 相比较 2004 年, 所占比例减少了 68.8%。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整体上有一定的增长, 同时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显现出来。

另外, 在“当外出收入平均每月达到多少元时, 您更愿意外出务工”一项调查中, 有 44.7%的农民工选择在 1500-2500 元范围中, 选择 1000 元以下的占到 5.7%; 1000-1500 元的占到 12.3%; 2500-3000 元的占到 12.3%; 3000-3500 的占到 10.4%; 5000 元以上的占到 11.4% (见图 5)。这表明, 随着经济发展, 城乡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工群体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有了新的期待。

在进行访谈时, 调查者也感受到, 农民工对于工资水平的期望越来越高。一方面由于物价上涨, 生活开销不断加大; 同时, 他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 从单纯地满足临时性需要到发展性需要。另外, 借助手机、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途径, 他们的“人脉”更广, 工作选择余地更大, 有更

便利的条件实现自己对高工资的追求。在北京东城区某家餐馆做主厨的小魏春节后将到海淀区的一家餐馆工作，这次工作的换动将使他每月的收入增加至少 500 元钱。“这是朋友给介绍的。我们厨师有个 QQ 群，平时没事就上网聊几句，北京各家餐馆的状况都知道得很清楚。”

图 5：农民工期望的月平均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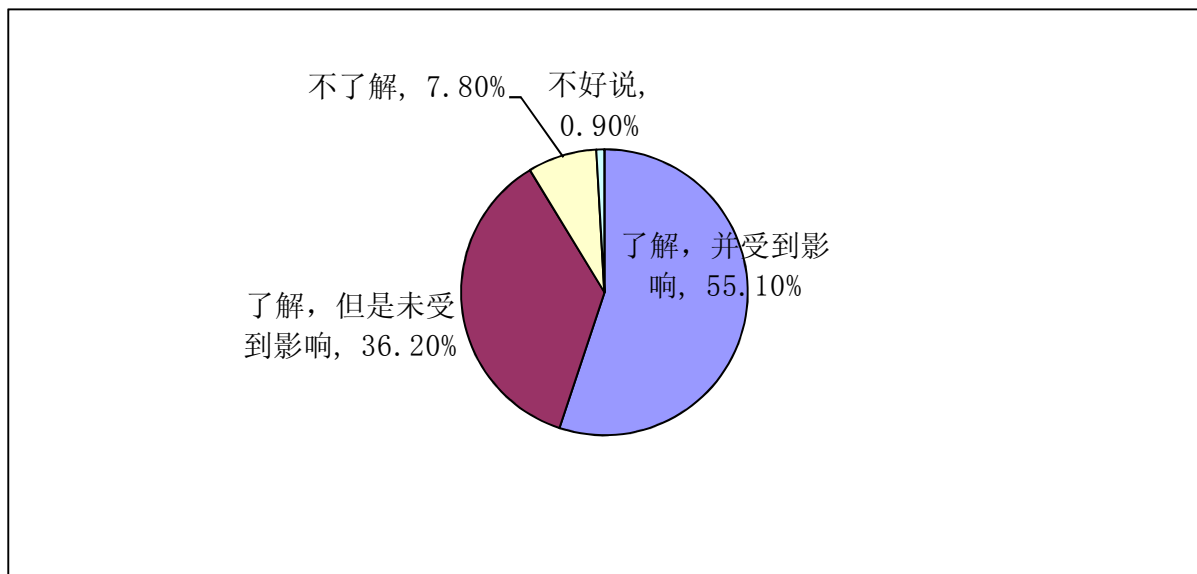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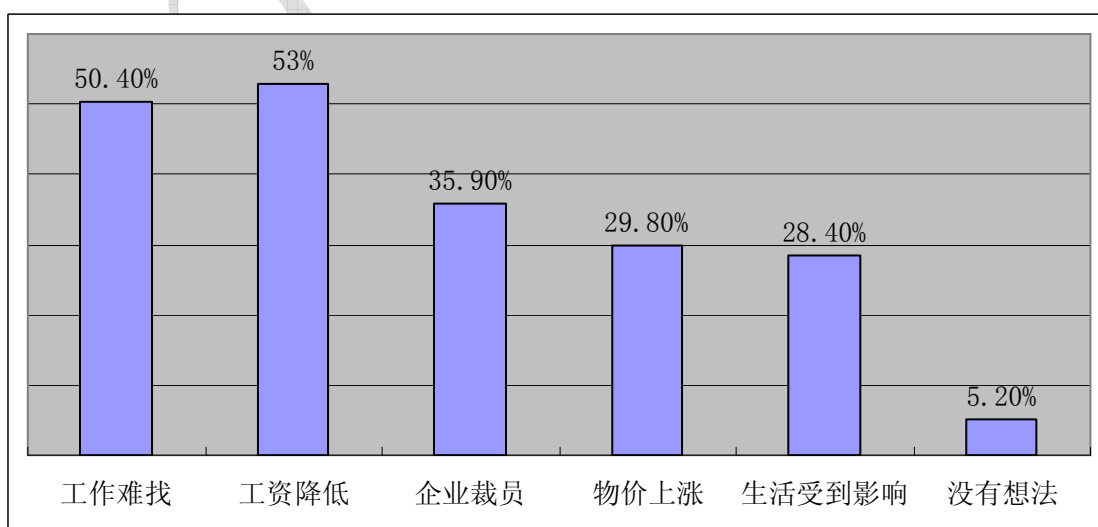
本次调查中，有 233 人认为自己了解金融危机，并认为金融危机已经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影响，占 55.1%；而了解危机，但认为目前没有什么影响的有 153 人，占 36.2%；还有 33 人表示不了解，没听说也没受到影响的，占 7.8%（见图 6）。相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工业区的打工者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身处内陆的打工者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这一点也印证了大多数调查者的感受，金融危机对于沿海工业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工业区影响是比较大且明显的，对农民工的生活也造成了直接影响，对内陆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尚未明显显现出来。

图 6：农民工对金融危机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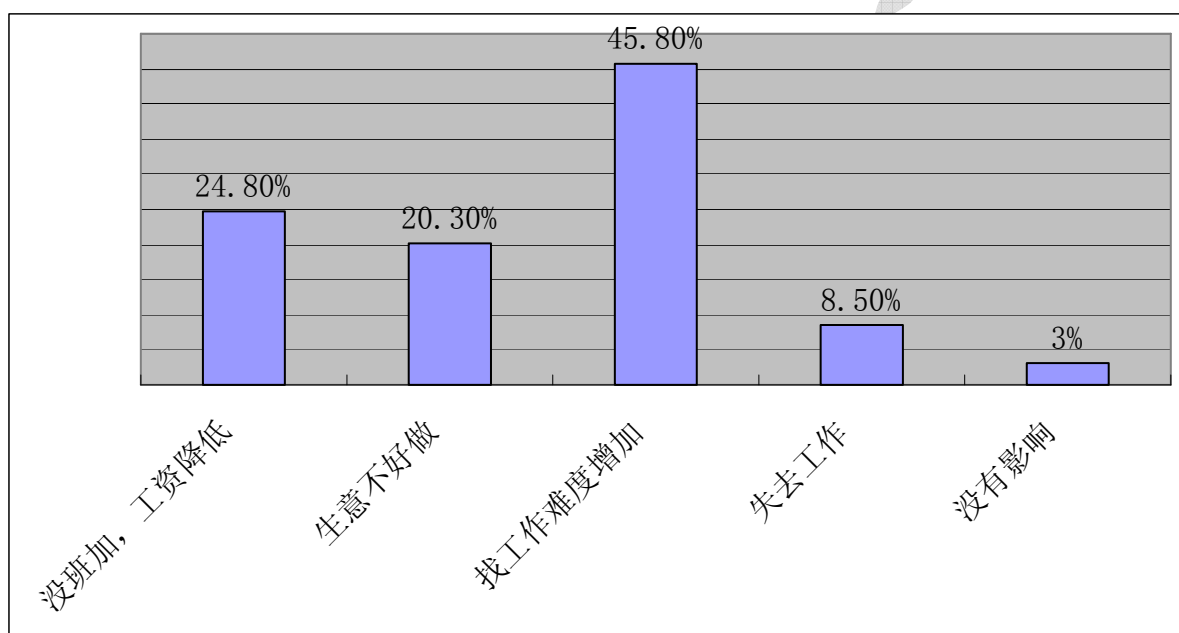
在进一步了解中，我们发现，当听到金融危机这个词，“工资降低”、“工作难找”是农民工最直接的两个反应，分别占到 53%和 50.4%；35.9%人次想到“企业裁员”，29.8%人次想到“物价上涨”，28.4%人次想到“生活受到影响”，也有 5.2%的人没有想法，认为没有什么影响（见图 7）。

图 7：农民工对金融危机的第一反应



对于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工作所造成的实际影响，24.8%的被调查者表示因为金融危机的来临没有加班，工资收入明显降低；45.8%的人感到找工作的难度增加了；20.3%的人觉得生意不好做了；8.5%的人因为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另有3%的人觉得没有影响（见图8）。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对农民工造成实际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大量农民工收入降低，其次是就业困难。同时，调查也显示，基本工资以外的加班收入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组成。

图8：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实际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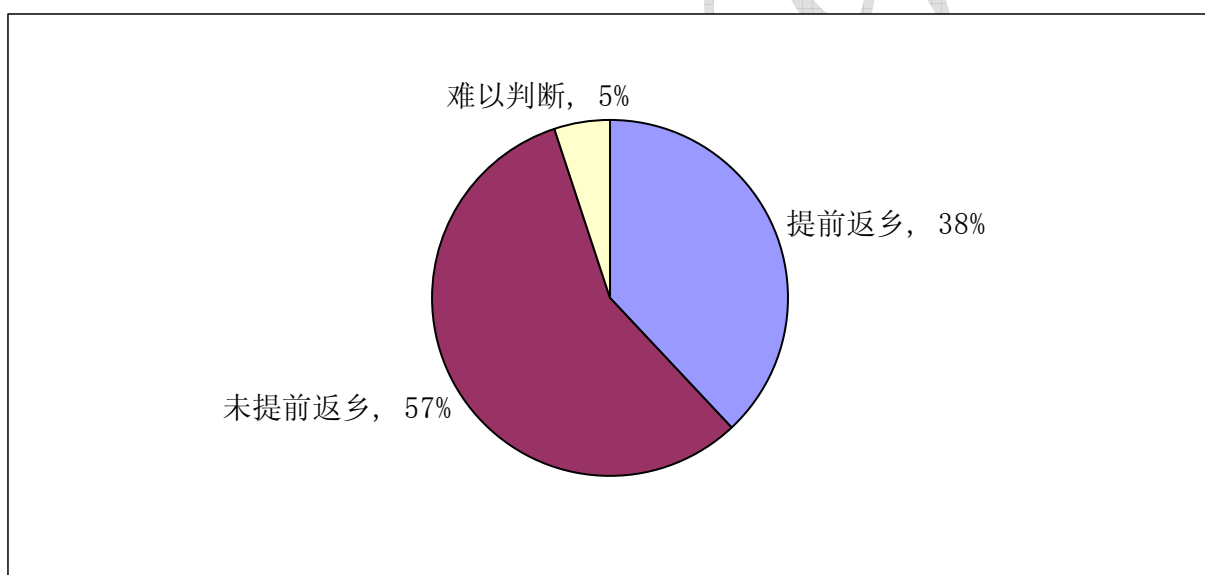


而在涉及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却有45.4%的人选择了受到一点影响，但没什么变化；12.5%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对自身没有影响；37.6%的人选择每月支出明显增多，影响比较大。农民工尽管遭受着金融危机造成的工资下降等直接影响，但并未将其视作严重性的危机，他们正在通过自身调节，努力将遭受到的不良影响自我化解掉。这也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严重地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但是随着其持续存在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他们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并引出一系列问题，这一点在个案访谈中调查者感受较深，因为市场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其中某个环出现问题，其他环节也将受到影响。比如现在一些沿海城市工业区的主要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订单骤减，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开始裁员、降薪，迫使工人不得不离开工厂，工人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工业区的餐饮、商店和娱乐场所的经营等，这种影响，又进一步反作用于农民工的社区生活。

（二）提前（非正常因素）返乡人群的基本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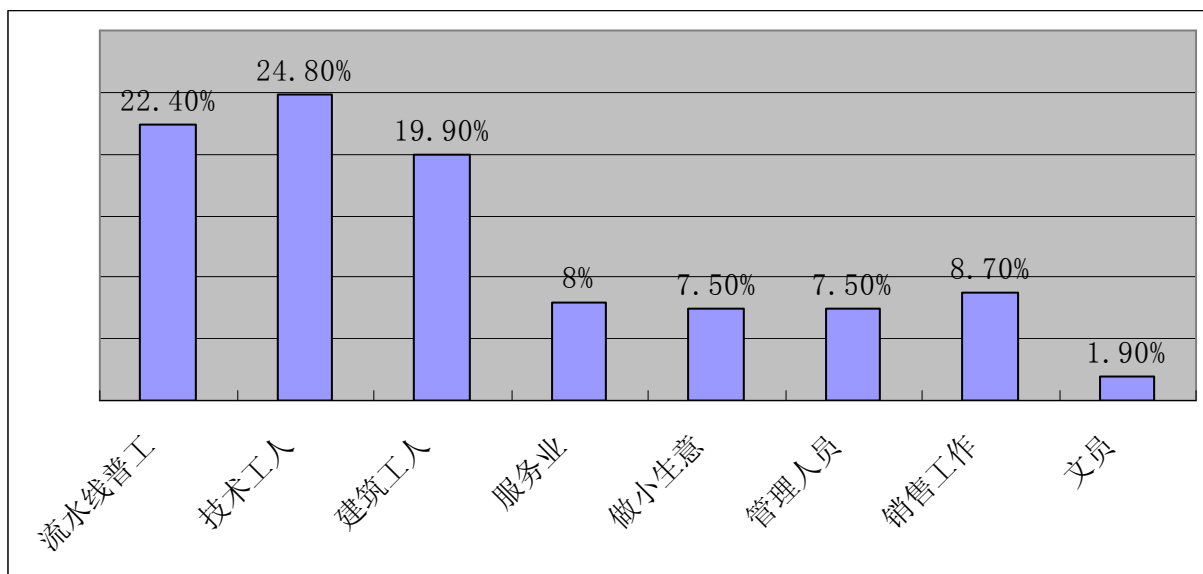
此次调查的 422 份问卷中，包括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提前（非正常因素）返乡农民工和未提前（正常返乡或留城）返乡农民工。其中非正常因素导致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 161 人，占总体人数 38%。其中男性 112 人，占 69.6%；女性 46 人，占 30%。未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 239 人，占总体人数 57%；男性 144 人，占 60.3%；女性 95 人，占 39.8%；另有 5% 的人难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提前返乡（见图 9）。

图 9：是否提前返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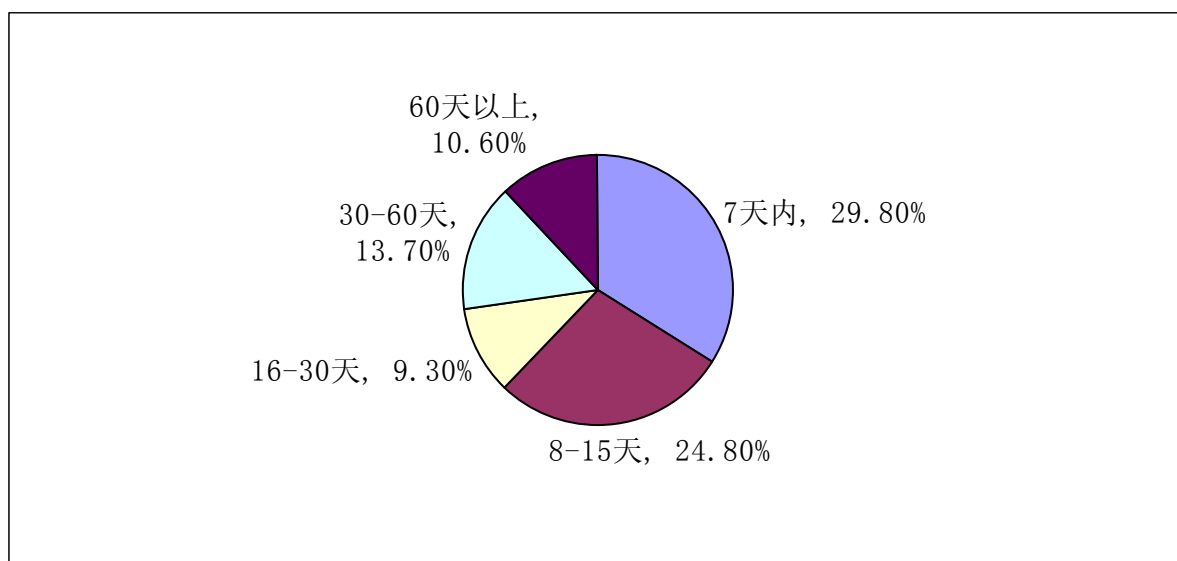
调查显示，提前返乡的人群中，从事流水线普工的占 22.4%；技术工人占 24.8%；建筑工人占 19.9%；从事服务业的占 8%；做小生意的和管理人员各占 7.5%；销售行业的占 8.7%；文员占 1.9%（见图 10）。不难发现，今年提前返乡情况存在于各个行业，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发现金融危机正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独立于经济链条之外，避免危机波及。

图 10：提前返乡人群职业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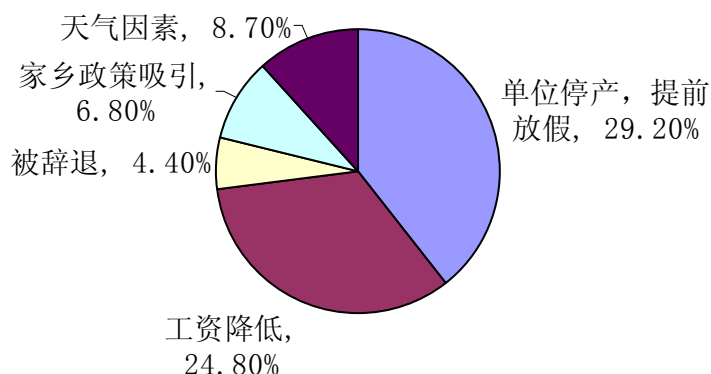
调查显示，相比以往的春节返乡时间，农民工提前 7 天以内（含七天）返回家乡的占 29.8%；提前 8 天到 15 天的占 24.8%；提前 16 天到 30 天的占 9.3%；提前 30 到 60 天的占 13.7%；提前 60 天以上的占 10.6%（见图 11）。通过调查者集体的访谈信息反馈，08 年底提前返乡现象的确比较明显，往年的回家时间一般是在距离春节一周内，但是 08 年春节近 60%的打工者是提前近两周回家的，他们自己也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或直接或间接。比如，一名安徽籍打工者在广东东莞是以收废布条为生的，由于金融危机，服装厂的生意受到直接影响，订单减少，他的生意也受到了间接影响，收不到材料，不得不提前返乡。

图 11：农民工提前返乡时间长度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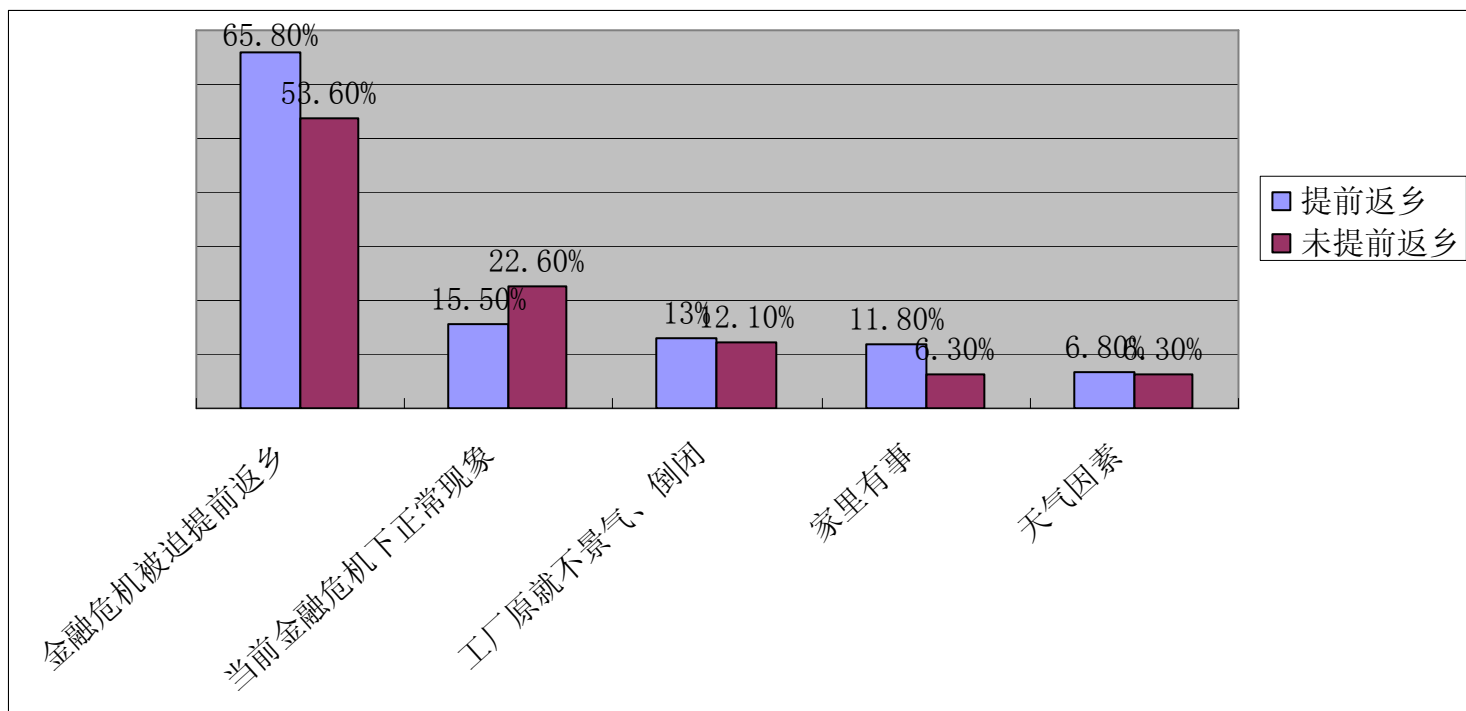
提前返乡的原因中，29.2%的人是由于工厂停产，提前放假；24.8%的人因为工资降低，不想做了，选择提前回家。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有比较强的自我调节机制，当某一处的就业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会自发选择其他道路，迅速向选择性更高的地区流动。调查中有 4.4%的人已经被辞退；深度访谈折射出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足，部分被裁员工的劳动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有 6.8%的农民工是由于政策吸引想回家创业。这些农民工身处异乡，通过媒体了解到返乡创业的信息。如果因媒体的过度渲染而使大批农民工盲目乐观辞职返乡，在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的状况下，他们面临的创业风险显然更大。一旦失败，生活无疑雪上加霜，同时对城市或乡村造成更大的压力。另有 8.7%的人因为天气寒冷选择回家，这部分人主要在北方从事建筑行业工作（见图 12）。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工厂效益，使得工人“没活儿干”，提前放假回家的农民工占多数，留在城市生活物价上涨，收入减少，“挣的不如花的多”，是农民工选择提前回家过春节的主要因素。

图 12：农民工提前返乡原因



当问及“您如何认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时，认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提前返乡”的，在提前返乡农民工中占 65.8%，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53.6%；认为“属于目前金融危机下正常现象”的，在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15.5%，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22.6%。在农民工群体对金融危机的了解中，已经将“提前返乡”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但并不认为“提前返乡”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必然影响，认为“原来工厂就不景气，工厂倒闭”的在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13%，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12.1%；认为“非金融危机因素，由于家中有事先回家”的在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11.8%，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7.5%；另有认为是“天气寒冷，工作受到影响”的在提前返乡农民工中占 6.8%，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 6.3%（见图 13）。从上面的数据和调查者的整体访谈情况来看，提前返乡者均是一定程度上涉及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性的因素，像北方地区冬季寒冷天气的影响。比如一位农民工在分享时说到，“我们在山东烟台，今年那边天气比往年太冷了，工地不让施工，所以就先回来了。”对于北方地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这就属于正常的季节性提前返乡。

图 13：农民工对提前返乡现象的认识



返乡后遇到的问题与困惑

(一) 提前（非正常因素）返乡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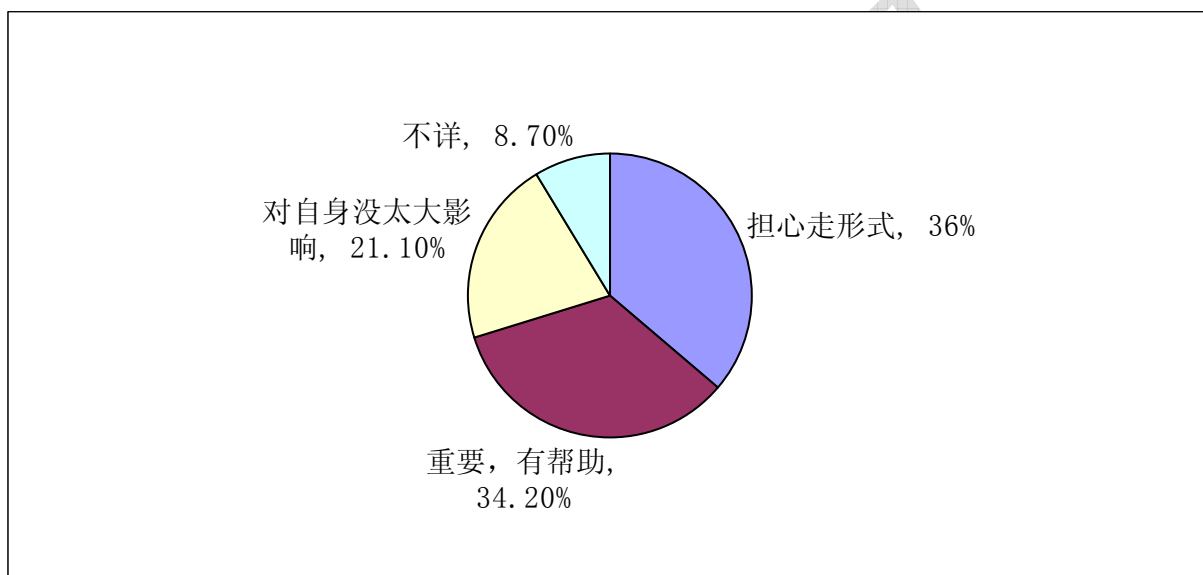
调查显示，提前返乡群体中，有 57.1% 的人返乡后表示家乡和外面一样，就业形势严峻，工作难找；33.5% 的人回乡后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就业情况；5.6% 的人回乡后工作比较好找。结合深度访谈分析表明，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家乡，本来都属于就业途径缺乏的劳务输出地，因此，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供应本来就非常有限。而 5.6% 的回乡就业情况较好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内陆地区的就业存量上升，农民工就业区域呈现多元化。

针对农民工返乡，当地有哪些优惠政策及服务支持，调查显示，提前返乡群体中 34.8% 的人反应是不知道；了解家乡提供小额贷款创业的占 22.4%；有定期提供就业信息的占 15%；鼓励创业，提供技术支持的占 12.4%；免费提供就业培训的占 13.7%；了解到可以及时简单办理创业注册手续的占 8.1%；有 25.5% 的人则表示家乡没有任何支持。

对于家乡对返乡农民工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服务，接受调查的提前返乡农民工中，36% 的人担心只是形式，没有实际作用；34.2% 的人认为这些信息很重要，

也很有帮助；21.1%的人觉得对自身没有影响和帮助（见图 14）。一位来自安徽的志愿者在对 8 名打工者进行访谈中了解到，他们对于当地有关部门有关返乡农民工的优惠政策了解得比较模糊，也只是听到电视里会播放“致返乡农民工的一封信”，但也没有实际的帮助，“都是口号，不管用，要是真的办实事，就应该到乡里到村里来招生做培训，你说电视里喊来喊去有啥意义。”返乡农民工大都是回到农村社区，而不是在县城，所以培训、就业政策服务的落实需要找到符合农民工的途径与方法，而农民工最担心政策只会成为口号和过场。

图 14：提前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相关支持政策的评价



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在工作受到影响后更迫切需要外界的支持。调查显示，提前返乡农民工中，74.5%的人没有接受过培训；17.4%的人表示接受过培训（见图 15）。在参加了培训的人中，14.9%的人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11.8%的人接受了就业信息方面的服务；10.6%的人接受了创业指导培训；3.7%的人接受法律方面培训；人际关系、生活技能、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均占 6.8%；健康知识（含职业健康）培训占 1.2%；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培训占 3.1%；人生与职业规划培训占 2.5%（见图 16）。从总体数据来看，大部分的提前返乡农民工尚未享受到相关部门的服务，接受了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培训，主要涉及的是职业技能方面的，法律、健康、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等综合保障性知识比较少。

图 15：提前返乡后是否参加了有关部门提供的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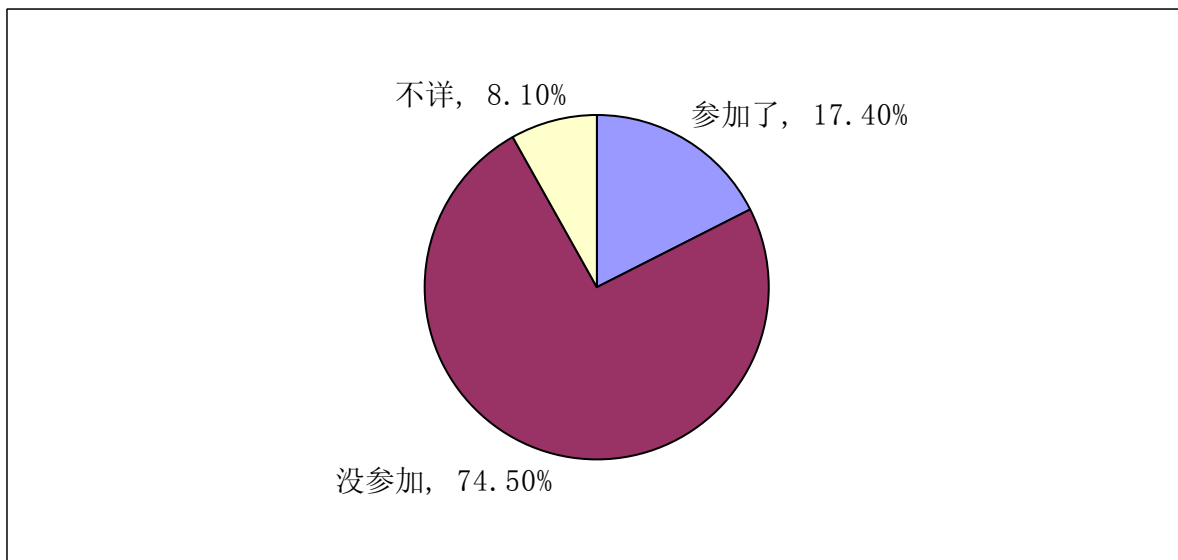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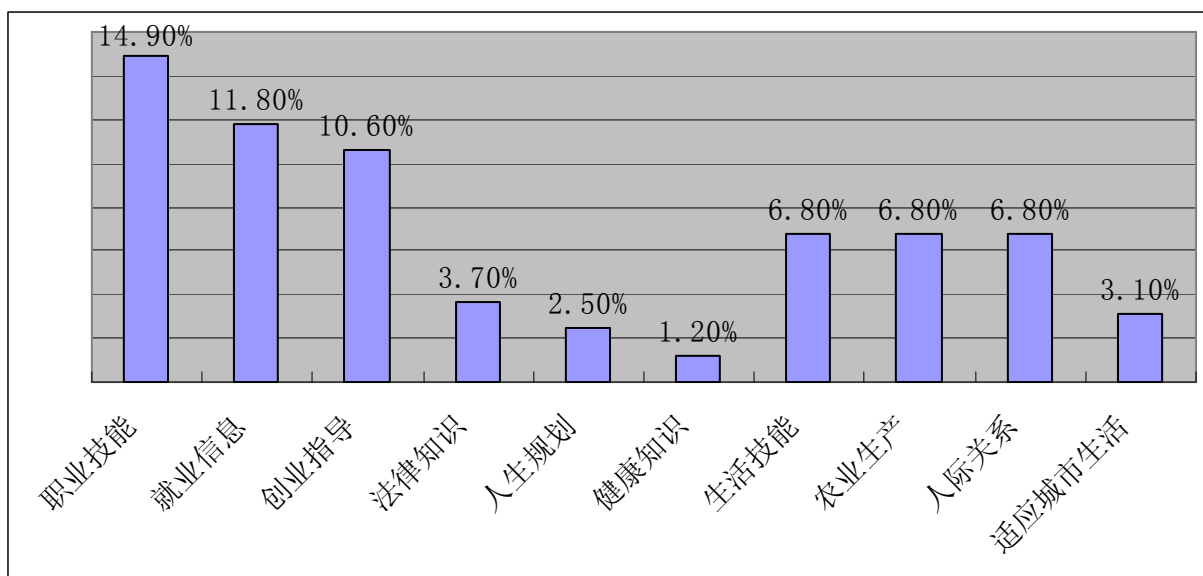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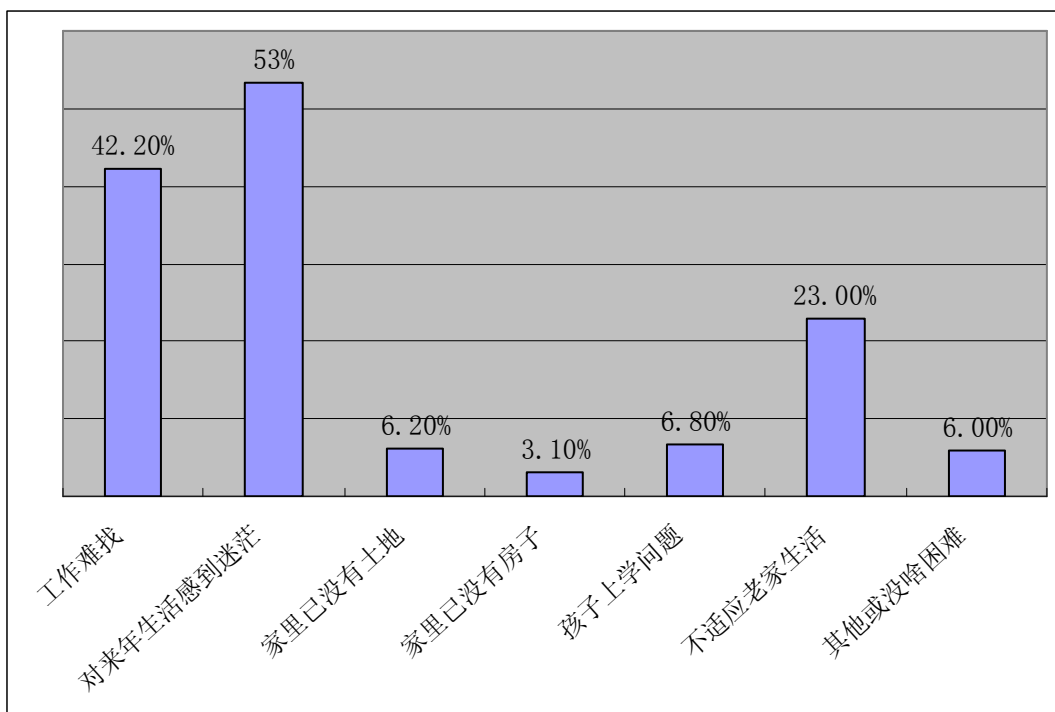


图 16：提前返乡农民工接受培训的具体内容



问卷显示，返乡后，农民工的困难体现在对 2009 年的打算比较渺茫，占 53.4%；工作难找占 42.2%；习惯在城里生活，回老家不适应占 23%；家里没有土地占 6.2%；回乡后没有房子住的占 3.1%；回乡后孩子上学要重新找学校的占 6.8%（见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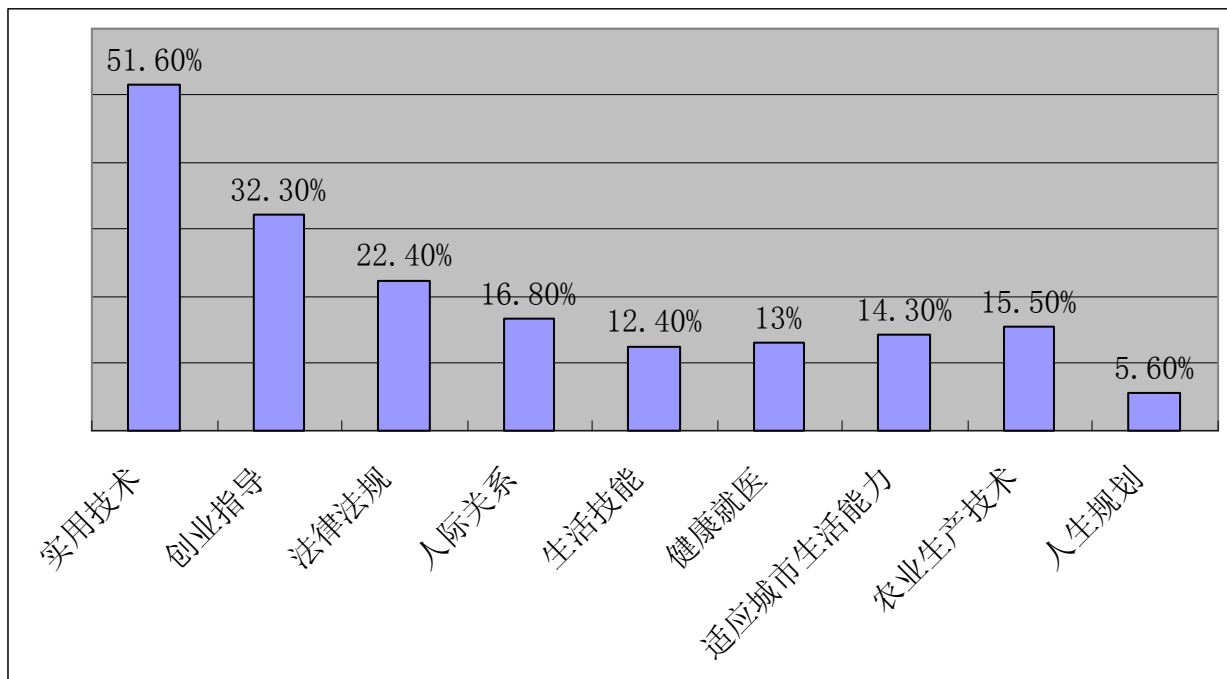
图 17：提前返乡农民工返乡后的主要困难



问卷显示，在影响农民工长期在家乡发展的因素中，选择挣不到钱的占 44.1%；没有发展资金占 37.3%；不好找工作占 33.5%；不知道该干什么的占 29.2%；家乡靠人情，不习惯的占 18%；老家生活封闭不如城市机会多的占 25.5%；在老家生活没意思占 4.4%；孩子不习惯家里生活环境的占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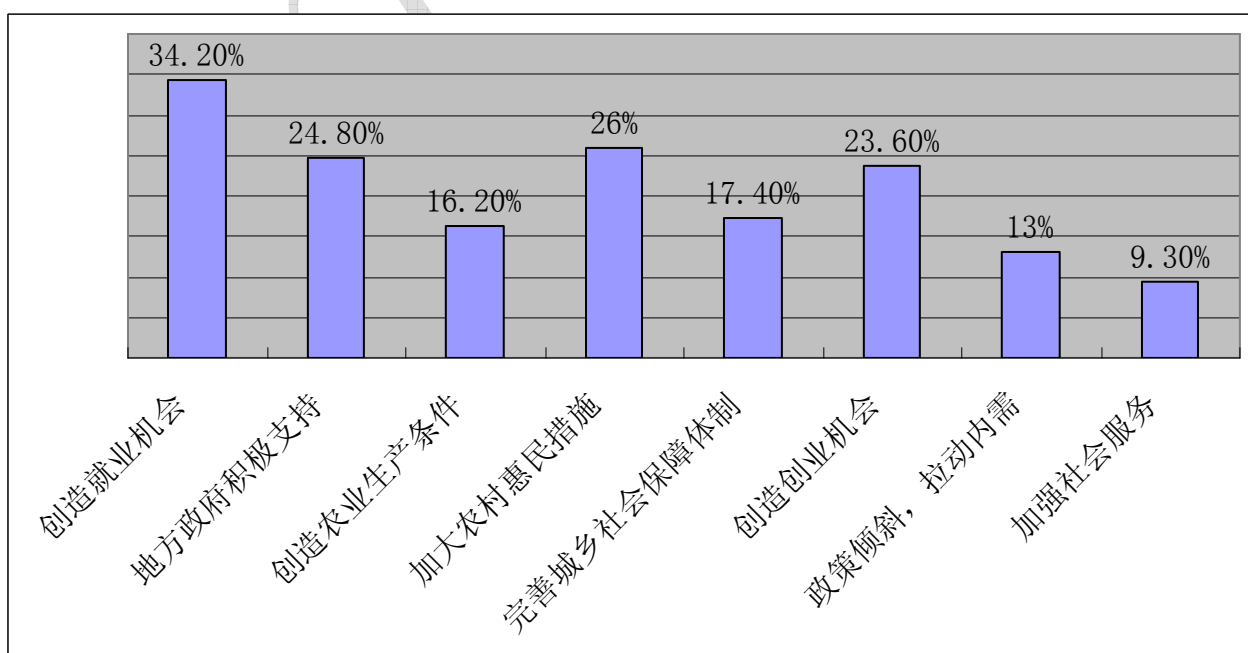
此次调查的提前返乡农民工最需要的培训分别为：外出打工的各种实用技术，占 51.6%；创业指导占 32.3%；法律法规占 22.4%；人际关系占 16.8%；生活技能占 12.4%；健康就医占 13%；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占 14.3%；农业生产技术占 15.5%；人生规划占 5.6%（见图 18）。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主要源于他们对依靠技术过上更好生活的期望，掌握一技之长是其最基本的就业保障条件，也可实现工资的提升。

图 18：提前返乡农民工最需要的培训



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对于金融危机影响的缓解或消除，最有效的方法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 34.2%人次选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给予支持，占 24.8%；创造农业生产条件，占 16.2%；26%人次选择中央加大农村惠民措施；17.4%人次认为要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制；23.6%人次选择创造更多创业机会；13%人次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倾斜，拉动内需；9.3%人次选择加强社会服务（见图 19）。

图 19：提前返乡农民工眼中缓解、消除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法



这组数据显示了返乡农民工对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期望和需求方向，首先是他们就业问题的解决，这是根本。在深入访谈中访谈员了解到，现在返乡民工的基本需要就是“希望这些好政策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把实惠真正送到返乡民工的手中，现在的政策得说到做到才是真正的好！”调查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农民工信赖政策，又怀疑基层政策执行力的复杂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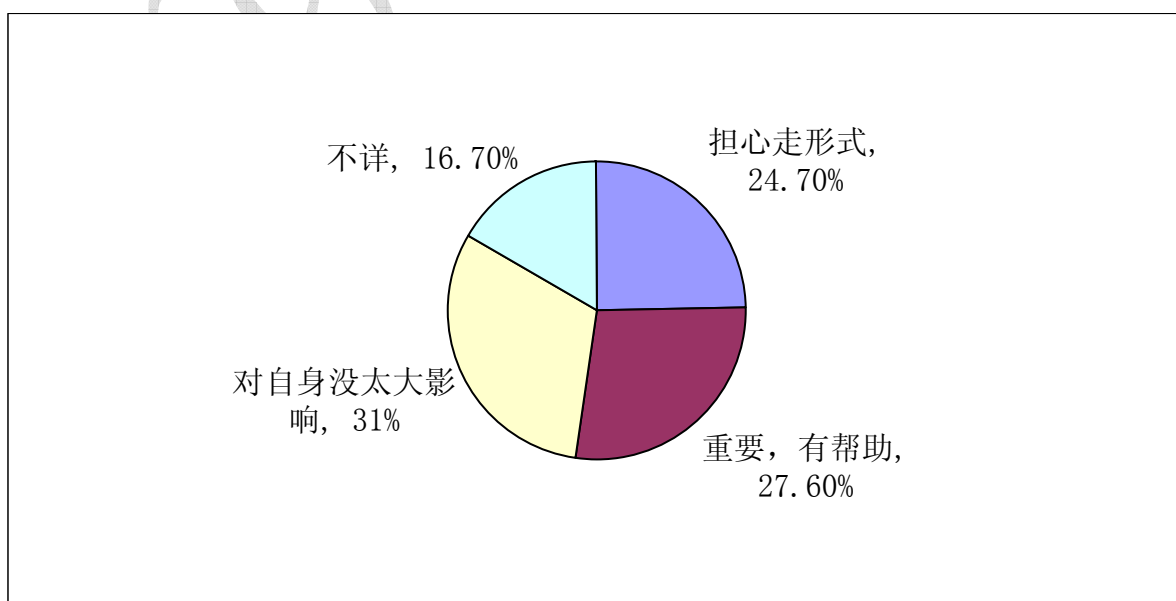
（二）未提前返乡（正常返乡与留城）群体

对于正常返乡与留城的农民工群体，调查显示，他们对于家乡就业情况的了解，45.6%的人觉得和外面一样比较严峻，工作难找；39.8%的人并不了解家乡的就业形势状况；6.7%的人觉得家乡工作应该比城市好找。

对于家乡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服务，39.8%的人表示不知道；17.2%的人表示家乡没有任何政策支持；18.4%的人了解到家乡有小额贷款；12.1%的人了解到家乡鼓励创业，提供技术支持；6.3%的人表示家乡定期提供就业信息；9.2%的人表示家乡提供免费就业培训；5%的人表示家乡对创业注册手续进行简单及时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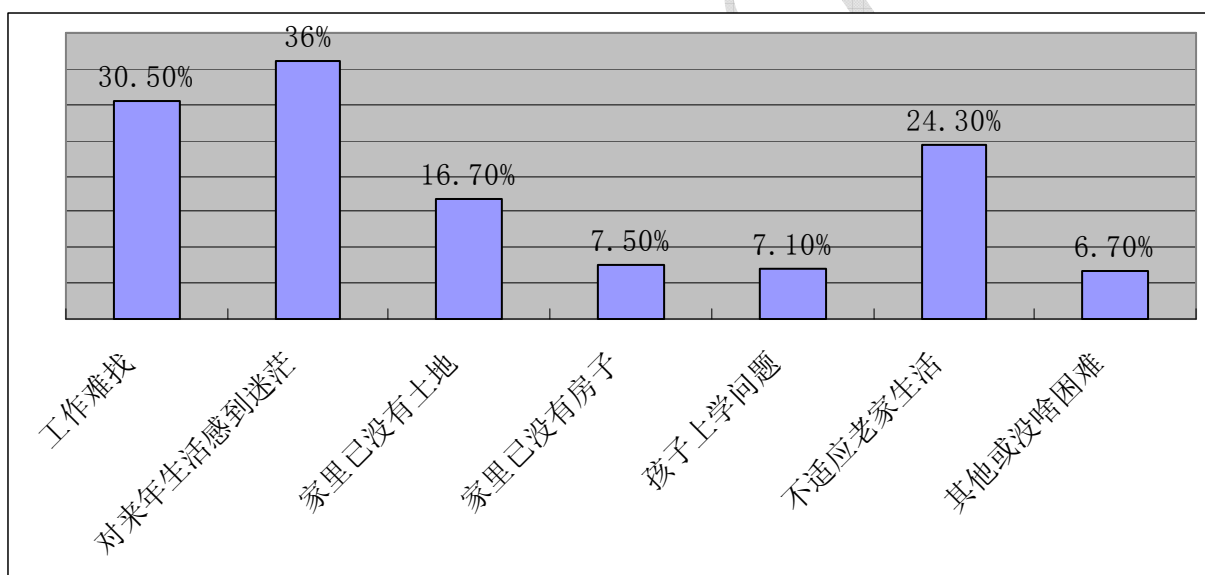
对于这些家乡政策，31%的人觉得对自身没有什么影响和帮助；27.6%的人觉得这些政策很重要；24.7%的人担心只是走形式，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见图20）。

图 20：未提前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相应支持政策的评价



大家面临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对明年打算渺茫，不知何去何从”、“工作难找”、“习惯城市生活，在家乡不适应”分别占 36%、30.5%、24.3%（见图 21）。对于新一年的经济形势，农民工普遍感到茫然，因此也需要更多的信心支持。这一数据也说明了为什么部分打工者舍弃了回乡过年的念头，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来年再进城找合适的工作比较难了，他们要“守住”自己的工作，同时超过 1/3 的未提前返乡农民工和因故提前回乡的民工有个共同的感到迷茫的地方：明年做什么，我将何去何从。因此对于社会和企业来讲做好这部分人的培训和人文关怀是很必要的。农民工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怀，以及人生规划和社会归属感的服务急需加强。

图 21：未提前返乡农民工设想回乡后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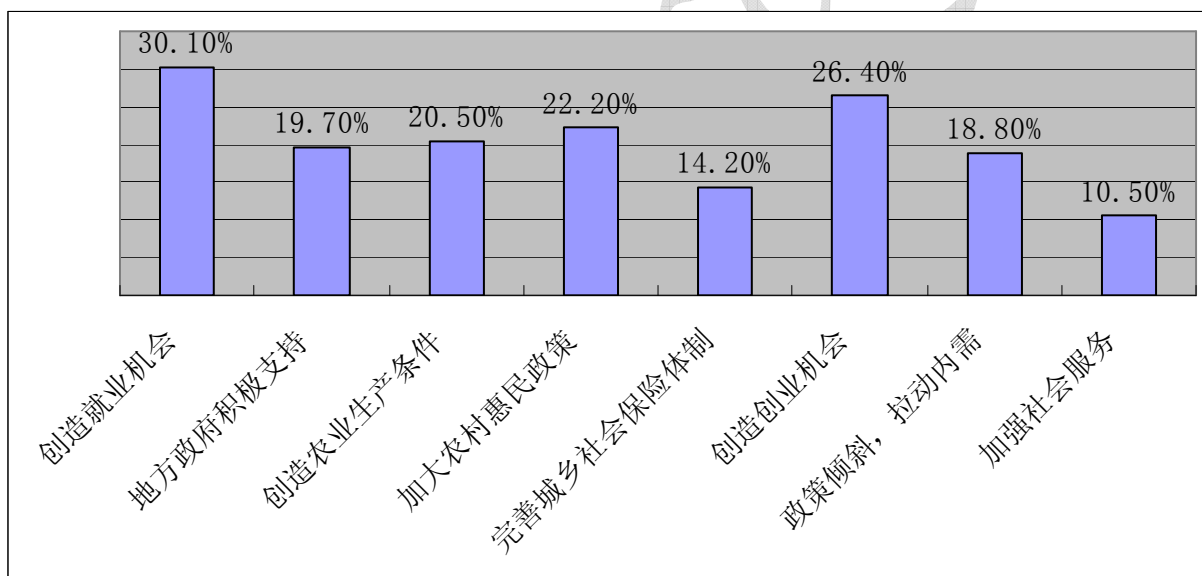
对于影响农民工在家乡发展的因素，未提前返乡农民工中，35.6%的人认为老家生活封闭，不如城市机会多；27.2%是因为挣不到钱；25.1%的人因为没有发展资金；23.4%的人不知道干什么；17.2%的人认为家乡工作难找。也正是这些方面单一或综合因素的作用，使得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而非在老家发展，这是比较现实的想法和做法。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造成的差异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阻力。

在培训需求方面，37.7%的人最需要外出打工的各种实用技术；28%的人选择创业指导；24.3%的人选择法律法规；19.7%的人选择人际关系。这一点是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保持一致的，因为这是共同的群体需要，他们追求的首先是客观的收入，更好的发展。访谈中很多地方的老乡也提到“外出打工的人都是家里

的顶梁柱，没他们不行，但是现在靠蛮力也不行，不学点技术怎么能行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民工对未来前途的困惑、对发展的迷茫，说明仅仅只是职业技术培训，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的发展需求。

对于消除当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方法，接受调查的未提前返乡农民工群体中，有 19.7%人次选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30.1%人次选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6.4%的人选择创造更多创业机会；22.2%的人选择中央加大农村惠民政策；20.5%的人希望创造农业生产条件；14.2%人次选择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制；18.8%认为应该靠宏观经济政策倾斜，拉动内需；10.5%建议加强社会服务。（见图 22）这和提前返乡农民工的选择基本一致，农民工最需要的就是平等的就业机会。因为这是生活的最基本保障，特别是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土地已经不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了，他们的需求和追求正在慢慢提升。这也是为何很多农民工“宁愿到城里继续找工作也不愿返乡”的一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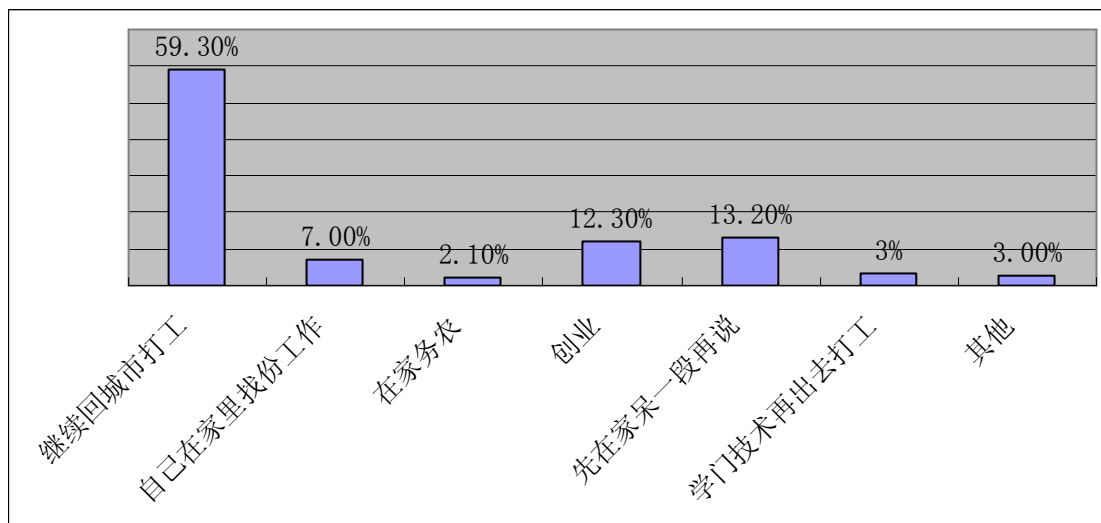
图 22：未提前返乡农民工眼中缓解、消除金融危机的方法



未来的打算

过完春节，59.3%的人选择继续回城市打工；13.2%的人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形势；7%的人决定自己在家里找份工作；12.3%的人想要创业；3.3%的人准备学门技术再出去；2.1%的人打算在家务农（见图 23）。因此，进城打工还是农民工的首选。

图 23：农民工春节后的打算



留在家乡不打算外出的调查对象表示，20.3%的人想自己做一番事业；18.4%的人认为城市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18%的人认为城里虽然收入高，但消费也高；17.2%的人认为现在农村政策好了，国家重视，因此选择在农村发展；15.6%的人觉得金融危机影响大，回城找不到工作；15.4%的人认为现在经济形势不稳定，想稳定后再做决定；13.5%的人认为在家工作能挣钱又能顾家；8.8%的人打算无论怎样未来都要在城市长期发展。

在选择继续回城打工中，28.4%的人认为城市机会大，发展好，虽然有危机影响，但仍比在家里好；23.9%的人认为老家没有出路，还是在城里好一点；18%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在城市打工没有影响；13.2%的人是公司还留着岗位，会继续回去；11.4%的人认为“农村虽有政策，但跟我没关系，改善生活还得靠自己打工”；10.2%的人是上一年的部分工钱没要回来。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倾向于回到城市的想法或欲望是比较强烈的。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依然存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工作仍需要加强。

对于如果条件许可，是否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发展的问题，40.4%的人因为城里机会多，发展快，愿意留下；22%的人为了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选择留在城市；17.7%的人认为城市生活丰富充实、13.7%的人认为城市设施齐全，吸引人留下生活。

24.4%的人不愿意留在城市发展，认为村庄是他们的根，更有归属感，而城市生存压力大，消费高，买不起房子，人情冷漠等。无论农民工做出什么样的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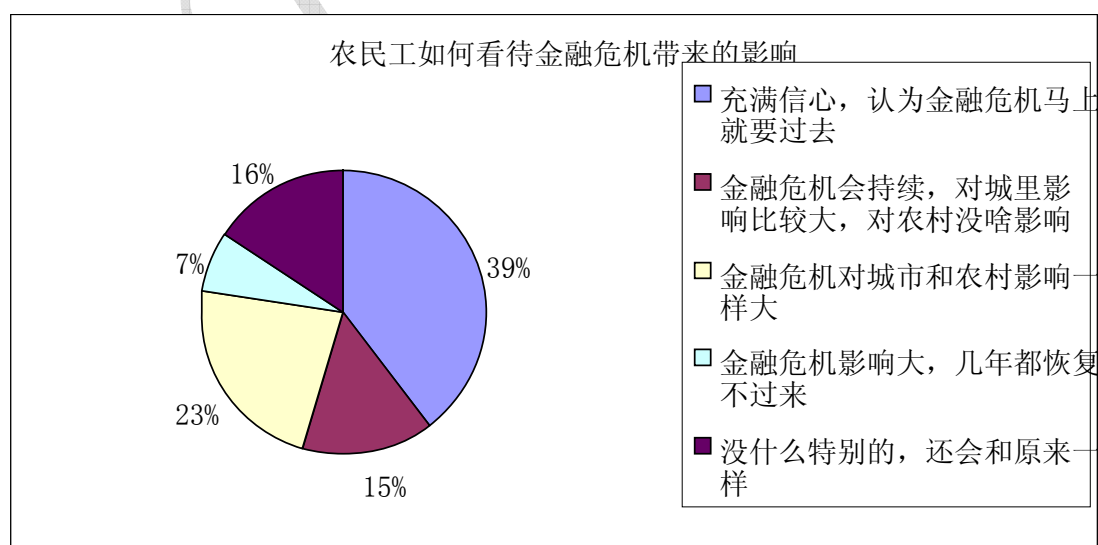
择，我们都应当给予尊重，在管理和服务上，需要创造城乡一体化的平等发展环境，以使该群体有更加多元化的发展途径。

关于对未来两年的工作、生活规划，32.4%的人因为金融危机而调整自己的原有规划；22.9%的人的规划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不大；15.4%的被调查者，规划未受金融危机影响；26.5%的人没有明确的规划。

在接下来的一年计划中，27.4%的人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收入会降低，生活受影响；18%的人认为外界因素与我无关，不会受影响；40.9%的人认为一切都不可预料，可能好可能不好，也可能没有变化。这一点告诉我们其实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并没有深刻的思考，就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言：“没有金融危机我要生活，有金融危机我也要生活，也要进城，要不然家里谁养，孩子上学怎么办？”调查说明，农民工处于较被动的发展状态，对自己未来的预期难以判断和掌握。

在回答你是否有信心应对金融危机给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的问题时，39.2%的人认为金融危机马上过去，对未来充满信心；14.7%的人认为至少持续2-3年，对城里影响比较大，对农村没有影响；22.7%的人认为对城市农村影响都一样；7.3%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影响大，几乎恢复不过来，15.6%的人认为没什么区别，还跟以前一样（见图24）。个案访谈表明，大部分农民工对生活依然充满期待，他们或许不明白金融危机到底会带来什么，但他们知道凭着自己的双手，可以开创自己的生活。

图 24：农民工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建议篇

生活在继续（下）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建议篇）

□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在本次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自己多年服务农民工的实践经验，提出以下感受与建议：

感受与建议

1、感受：与协作者 2004 年进行的“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比较显示，时隔 5 年，农民工中“高中、中专或职业高中、技校”的比例上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农村青年学校毕业（或辍学）后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进城务工。人口密集且就业压力大的中西部城镇的青年居民，也将到东部沿海大城市务工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选择。

建议：加强社会宣传，转变对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职业定位，及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没有素质”、“没有文化”的偏见认识，增强该群体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进而提升其参与社会发展的动力。

2、感受：随着长时期非农化转移的沉淀与影响，农民工举家迁移进城务工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5 年以上长期稳定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他们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就业领域，而是涉及城市社区生活的各个层面。

建议：农民工构成的重要变化，需要城市转变“暂住人口”的管理观念，创造平等参与的社区生活环境，将农民工服务纳入到城市社区服务，并改革传统

的静态的社区服务方法，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的发展需求，也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乡村部门应加强针对留守老人、儿童的公共服务，减轻农民工的发展压力。

3、感受：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企业缩减工作时间、放长假或裁员；而金融危机对于第一产业农业及农村的影响尚不明显；东南沿海工业区的打工者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身处内陆的打工者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建议：在保持对返乡农民工以及乡村发展关注支持的基础上，应着力拓宽沿海输入地城市的就业途径，做好失业农民工的心理安抚工作。除了从劳动权益保护的角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还需要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协助企业妥善处理好因为裁员、收入降低造成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冲突。

4、感受：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农民工收入降低、失业。同时，调查也显示，基本工资以外的加班收入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议：尽管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岗位呈现总体减少，但收入减少、“挣的不如花的多”却是导致农民工自动辞职的主要因素。因此，适度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反而可以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增强其抵御非正常因素带来的波动，拉动城乡消费，减少企业因工人非正常流动而产生的额外人力资源成本。

5、感受：时隔5年，农民工工资收入整体上有一定的增长，但随着城乡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代农民工对就业（技能）投入的加大，农民工群体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有了新的期待；另一方面，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显现出来。

建议：加强对农民工聚集的工业区的卫生、教育、交通、邮政、商业等生活服务的投入，降低农民工生活支出成本。同时，着重开展对农民工群体中的低收入人群的细分，给予相应优惠政策与社会服务。

6、感受：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家乡，本来都属于就业途径缺乏的劳务输出地，因此，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供应也非常有限，进城打工还是农民工的首选。而随着信息服务的发展，农民工借助手机、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途径，“人脉”更广，工作选择余地更大，当某一处的就业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会自发选择其他道路，迅速向选择性更高的地区流动，就业区域、领域将进一步呈现多元化趋势。

建议：除了对返乡农民工的政策、服务支持，同样需要加强对留城农民工的服务支持，提升其适应城市生活、自我开拓寻找发展机会的能力，并对处于困境的留城农民工开展社会救助性服务。加强对非正规就业领域农民工的扶持与保护，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基本前提下，城市管理方面应致力于创造宽松的服务环境，尽量不要干预农民工在社区经济中的自我就业。

7、感受：农民工尽管遭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工资下降、失业等直接影响，但并未将其视作严重性的危机，他们正在通过自身的调节，努力将遭受到的不良影响自我化解。

建议：转变对农民工“可怜”、“同情”的施舍型的服务观念，正视农民工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在社会服务、经济建设中，创造适合农民工的参与表达渠道，征求农民工的意见，珍惜农民工群体蕴含的生活智慧、发展经验，鼓励开发农民工参与社会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创新的潜能力。

8、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以及媒体的宣传使农民工长期积淀的创业意愿空前高涨，农民工中出现小部分乐观辞职返乡创业的倾向。

建议：在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的状况下，条件不成熟而提早创业的农民工面临的创业风险显然更大。一旦失败，生活无疑雪上加霜，对城市或乡村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创业尤其是适合农民工的小本创业的信息指导，协助其树立创业风险意识。改革金融信贷体系，鼓励商业银行依托社区部门、社会组织、工会的服务网络，开展低抵押、无抵押、信誉担保等小额信贷服务。

9、感受：国家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关注，以及由此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使农民工倍感温暖与鼓舞，并初见成效。与此同时，一些政策在具体落实中与农民工的实际状况很难契合。农民工也表现出信赖政府政策，又怀疑基层执行力的复杂心理。

建议：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采取政府采购、公开竞标的方式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确保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制定开放性的评估体系，尤其是加强农民工直接参与的服务成效评估。培育非政府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加强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建设，将政策落实为贴近农民工的生活细节、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专业化的参与式服务模式。

10、感受：农民工处于较被动的发展状态，对自己未来的预期难以判断和掌握。对于未来的自我发展趋势，农民工普遍感到茫然、困惑，大部分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建议：在关注如何短期内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升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同时，社会部门与企业应做好农民工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怀，加强提升农民工人生规划、职业规划的能力。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性改革，增强农民工的未来安全感、发展参与感、社会归属感。

（特别感谢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的大力支持；感谢韩进、张艳艳、李德书、钱传标、晏翔、汪映林、张伟伟、王海英、孙振亮、王瑞海、王双奎、张令航、弓利娥、弓家如、李霞、李明宇等农民工志愿者的参与。）

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

□ 北京协作者

返乡、返城，一年又一年，他们往返奔波，从城市、工业区到田野乡村。而这一年似乎有所不同，他们的迁徙格外牵动人心。金融危机来了，一些工厂倒闭或提前放假，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农民工会不会成为这场危机中脆弱的一环？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通知》，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作为一家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服务于流动人口的机构，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和农民工朋友们共度难关。

我们的行动从春节前开始。1月中旬，北京协作者启动“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现象调查”，委派16名返乡过节的农民工志愿者，于安徽、江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乡村，开展调查。他们以问卷及访谈的形式，回归生活的视角关注周遭变化，亲自拿起笔撰写调查报告，描述自己眼中的金融危机。同时，协作者工作员于北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针对未返乡农民工开展调查，展现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及具体需求，为政府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创新尽绵薄之力。危机还在持续，我们的调查也会持续进行。我们相信，这份来自民间视角的农民工参与撰写的记录，将是金融危机下中国图景的重要构成，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一种

意义。

2009 年，协作者将一如既往推动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服务工作。除夕，我们与无法返乡的在京打工者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共度除夕。探望社区孤寡老人，走访城郊流动人口聚居区，为留守他乡的打工朋友送上祝福。2 月 9 日元宵节，我们在协作者小院儿又一次迎来节后返城的农民工朋友。“团团圆圆闹元宵”联谊活动上，打工朋友、志愿者、社区居民等 80 余人欢聚一堂，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 2008，并对新一年开展的各项活动及可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进行展望。面对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希望从具体服务与情感支持两方面，为农民工朋友提供帮助，使大家平稳、坚强而积极的面对压力。

在协作者的小院，日常服务活动每日进行，我们与街道、社区居委会继续携手共建社区流动人口服务平台。很多人惊讶，在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胡同里，竟然居住着 1300 余名流动人口。除了如去年一样服务社区流动儿童，09 年，工作人员将深入家庭，着重提升倚靠社区经济为生的社区困难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发展能力，大家在这一平台上彼此了解、接纳，使社区新老居民彼此团结互助，在具体的社区服务中消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2009 年，协作者将一如既往的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加强流动人口的情感心理层面服务。2 月 14 日情人节，我们组织了“爱你一万年”打工者情人节联谊晚会，为在京打工者提供交流平台，分享彼此情感故事。这些在工作压力、生存压力下，将自身情感需求压缩至最低限的打工朋友们，“头一遭，过上了洋节”，在执子之手的温情里，携手走进这个春天。随后，2 月 15 日下午，协作者启动“坚持美丽梦想”电影成长小组活动。选取一系列励志电影，借助每周日电影小组的平台与打工朋友们彼此分享工作生活，相互鼓励，树立信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2009 年，协作者将继续开展农民工能力建设服务。为在京流动人口组织的社区英语小组将于 3 月启动，以提升打工朋友的多元化就业能力。我们相信，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我提升，将压力化作动力，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促进发展。

在我们日常开展探访服务的城市边缘社区，一些农民工朋友的工作已经受到影响。08 年，协作者“新市民培训”走进这一个个社区，与打工者们分享了人生价值、法律知识、城市生活技巧、职业规划等等课程。在此基础上，09 年，我们将针对居民需求，深入开展城市新生活能力主题培训活动，发掘农民工自身潜力，动员社区的互助力量。

2009 年，协作者将继续广泛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募集二手衣物、生活用品等，针对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家庭进行发放，并募集图书、学习用品等，为服务的流动人口社区筹建活动中心，通过公共设施与自我服务模式的配套，增强社区凝聚力，建立社区互助机制，增强大家的生活信心。

2 月底，协作者“流动书桌”助学计划 09 年第一学期的走访工作已经完成。这项与爱心人士携手进行了 5 年的助学计划，致力于为家庭贫困的打工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08 年，有 22 名流动儿童因此重返校园。09 年，我们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增加，而这一愿望的实现，需要更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与奉献。

我们也在与更多的机构、合作伙伴分享着我们的经验。09 年 1 月，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赴广西，为当地职业学校教师开展 TOT 培训（培训者的培训），并作为顾问主持指导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编写准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培训教材的修订研讨会。珠海、南京等地的社会工作者也分享了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并将此经验运用于社区流动人口、工业区流动人口的服务上。

在金融危机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与支持，更看到了农民工群体自身不抛弃不放弃的努力。对于这个群体，风险似乎格外多发。真正平稳度过危机，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他们自身。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自身蕴含的潜能，希望通过专业的服务，协助他们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危机必然孕育着机会，而这场转型漫长而艰难，协作者愿与所有农民工朋友一起走过。

.....

农民工是“廉价劳动力”，更是社区的生活者；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更是蕴含巨大潜能力的建设群体。

金融危机，我们反思什么？

□李涛

有一个游戏，有助于我们找到生命中最值得去做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情：问问自己，大难当头之际，什么事情是你最无法割舍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涉及你人生发展中的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因素。

社会如人生。10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先后遇到了两次殃及全国的灾难，一次是 6 年前的 SARS 危机，一次是今天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两次危机

中，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农民工。

从 SARS 到金融危机，我们再次看到社会各界痛心疾首的思考与呼吁，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与关注，透过“关爱”、“善待”、“加强”……慢慢的品出这其中渗透的不安：“农民工会不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农民工当作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容易失范的群体。

事实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正是在家乡无法实现就业、无法获取现金收入的农民，他们早就是失业群体，而他们选择的却是背井离乡，用自己的双手争取体面的生存。如果他们要偷、要抢，当初何必出来受这份窝囊气？！

没有一个农民是揣着卖猪换来的路费，进城去打劫，“流动人口”是个大范畴，城市出现的一些流动人员犯罪，他们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两码事。常识告诉我们，大多数农民工都很老实，你拖欠他一年工资他都在那老老实实的，偶尔上个街讨个工钱，大家都觉得这事闹大了。调查显示，大量农民工都表现出一个共性：在城里面找不到工作，通常是在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就马上往别的地方流动，或者选择回到家乡去。他们都不愿意流落街头。道理很简单：他们觉得，如果流落到街头，这事让老乡知道了，传回老家就抬不起头了。在乡村熟人社会，传统伦理约束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知廉耻讲礼节的群体。

同样，没有一个农民工在外找不着工作就返乡犯罪，这道理也是常识。因为农村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一套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约束了他们的言行。农民工在农村不像在城市是流动人口，返回家乡有一种空前的归属感。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常识！相反，近日看到的报道，却是一位找不到工作、钱财被窃的农民工在广州火车站选择了割腕，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去打劫、去报复。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已是最后的抗争，如果鲜血还不能让我们改变谬论，我实在无话可说。

常识告诉我们，农民工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一位乡干部总结 20 年的乡村工作经验时告诉我，农民不患贫，患不均。这话直白的说法就是，农民从来不怕受苦遭难，最怕的是遭遇不公。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民工为人处事规则和对问题的分析判断，更加讲究公正性和是非人情的法理性。所以，不公才是导致农民工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关键因素。

我们要警惕有人试图制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神话。这同样不是第一次把农民工当作没有经济理性、缺乏进取精神的群体了。从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筑巢引凤”、“以创业潮促返乡潮、发展潮，一潮带三潮”，背后的思考却是怎样提防农民工与城里人争

饭碗，确保城市下岗人员的就业，“腾笼换鸟”！

回归到生活的常识中去看生活，该创业的农民工实际上都创业了，没有条件的也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就能创业！

市场经济是一个制造欲望的东西。创业当老板始终是农民工的梦想，这么多年来，遭受底层生活的压抑之后，恐怕没有一个群体像农民工这样如此强烈的渴望通过职业地位的上升进而改变社会地位了。农民工进城之后，大都有一个自我创业的梦想，只要条件成熟就会果断的去做，事实上，从乡村到城市，我们看到的非正规就业领域内的自我创业单位，从小卖部到包子铺，60%以上属于农民或农民工的自我创业的产物。而此次返乡是一个非正常现象，因为能创业的农民工早就回家创业去了，而条件不成熟的也没法创业。相反，大量的社会舆论影响，加上失业的压力，会迫使一些正在犹豫的人迫于形势压力，过早的开始创业，对这些不具备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而言，如果是因为找工作难而促使其创业，那么在目前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其面临的创业风险比平时更大。一旦创业失败，对于这些失业的农民工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也要警惕“就业救世主”的神话。当金融危机表现为失业加剧，当我们开始号召帮助农民工就业，我们更需要警惕：是否在习惯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否正不自觉的以“救世主”的姿态对待“弱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农民工当作缺乏就业能动性的群体了。建立一个全国有序、规范的劳务市场的口号已经喊了 20 多年，但农民工的无序流动却从未停止过。

20 多年来，全国大部分的农民工自己解决就业，或者通过老乡介绍工作，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的就业机会，真正依靠相关部门有组织的实现就业的农民工不到 10 %。而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们“帮助”了农民工就业，现实却是农民工创新了中国的就业模式！

这些都是常识。在理论与资讯泛滥的时代，我们需要回归到常识去看我们的生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故乡，走向陌生的地方，找工作，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租房子，看病，识别各种陷阱，受气……这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活智慧与勇气、值得尊敬的人。问题是，他们不是一个，而是上亿个，他们不仅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而且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变革，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同样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社会文化变革、消除城乡差别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新。而这样一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他们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平等的发展环境。只有回归到这个基本的常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与还原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追求的发展究竟是谁的发展？当我们追求无限上升的财富指标

的时候，是否可以同等重视最底层的保障网的建设？我们并不反对每个个体都可以得到上不封顶的财富积累，但我们至少要保证每一个向下坠落的弱者都得到最下限的生存安全的保障。我们对社会保障的跨地域转移的改革期待了太久，以至于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可以实现全球化的转移，我们依然在期待社会保障的跨省转移。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金融体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努力注资帮助一些“500强”更强的时候，为什么视最需要资金的穷人于不见？我们并不反对强者可以得到更强大的资本的支持，但我们至少也要满足穷人的最基本的发展资金的需求。我们认为穷人是没有信用的，那么，那些使大量财富蒸发，最终酿成了这次空前金融危机的人，信用又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就业用工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出台各项优惠落户政策吸引凤毛麟角的精英人才的时候，为什么视那些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流动人口于不见？我们曾经感叹“农民工都回家过年了，这城里连个卖菜的都没有了。”而今天，我们终于发现，“农民工都走了，我们的房子租给谁？我们的东西卖给谁？”卖与买，读音之差，却是“廉价劳动力”与“生活消费者”天壤之别的角色定位。如果我们对社区的邻居充满防范、排斥，我们的这个邻居也不会热爱这个社区，当这个社区遭灾的时候，他将跑得比谁都快。城市只有把农民工当作家人，农民工才会把城市当作是自己的家，同患难，共担当。城市如此，乡村如此，国家亦如此。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治理结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市场部门的时候，是否应该同样重视第三部门的发展需求？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自由的经济市场，同时我们也需要填补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社会真空。通俗的说法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如同一只三条腿的凳子，其中一条腿是政府，一条腿是企业，一条腿是社会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稳定的保障。当凳子倒了的时候，祸及的不仅仅是位于凳子最边缘的人，而是坐在凳子上的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第三部门，发展社会组织，并非边缘群体、困难群体的需要，而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服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日益加大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同等重视服务的有效性？中国改革的焦点正在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民生问题，传统的静态的社会服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高度流动、分层的社会结构需求，而社会服务的创新，需要技术化、专业化、社区化、社会化，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培育社会组织，推广社会工作，开放社会服务——由行政化的社会服务转变为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由政府包办的社会服务转变为公开采购的社会化的社会服务，由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社会服务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社会服务。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政策落实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全民对某个问题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这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我们为了凸现对该问题的重视，

往往会过分强调全社会各部门采取一个步调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否依然希望通过运动、口号去解决社会问题，而非技术、方法、理念？面对金融危机，解决就业、促进创业似乎成为各个部门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每个部门、每个组织按照社会赋予的角色期望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的本份，自然就是对问题最好的回应。“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到了下面就走了样儿”——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农民工信赖政策，却怀疑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能力的复杂心理。这是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践行实事求是的真理，以可操作、可衡量、可实现的评估标准考量政策的成效，这些常识的智慧，远非某些专业评估精英能力所及。

灾难面前，人人平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的标准，不是只看这个社会的精英得到了什么待遇，而是我们要审视底层的边缘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只有灾难让我们刻骨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如此的平等，从 SARS 这样的瘟疫性灾害，到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性灾害，从华尔街的精英，到流水线的苦力，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难者。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要再以救世主的姿态面对弱势群体、面对农民工了，需要拯救的实际上是我们全部的人。这是常识的判断。

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开放的就业制度，建立更注重雪中送炭的金融信贷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工作，剩下的事情，放手让农民工自己去做吧，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不如放手，相信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好。

痛定思痛，这是我们对待历次危机与教训最正式化的反思态度，而好了伤疤忘了痛，却是我们对待历次危机与教训最生活化的处世态度。

某项政策的改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社会服务模式的创新可以有一段时间的探索，而城乡分割、贫富差距造成的文化、心理的差异，隐藏在背后的“等级意识”，却是需要一个民族拿出百年的勇气去直面的。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开放社会，我们旗帜鲜明的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如既往的体恤这个国家最底层人群的利益保障。我们相信，SARS 过去了，金融危机也终将会过去，两会正在召开，我们还会迎来并创造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

而形式多样的危机也会始终存在。人类的进步并不在于我们存在了多长时间，经历了多少事，而是我们记住了多少，借鉴了多少。

（协作者之友通讯，如需转载，请注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供稿，并请告知）

电话：010-8621-9405；电邮：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